



《记忆》八十六期

目录

【特稿】

唐 伟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读后

【博士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二）

【书讯】

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在港出版

【问与答】

陈闯创的问题：关于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 39 人名单
和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 59 人名单的问题

1、卜伟华的解答 2、余汝信的解答

【检查与揭发】

李慎之 交代我和吴冷西的关系并揭发吴冷西的反动言行

【资料】

蒯大富 1966 年 6 月 27 日“声明”

【来信选登】

沈迈克致信本刊

按：此文是关于清华大学历史和教育的—篇重要文章。作者不仅描述、分析了清华的两派，以及他们所依恃的理论。而且对清华的教育及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精辟的剖析。本刊曾编发过两期“清华文革”专辑，并刊发过多篇关于清华文革的文章，在反思的深广和文笔的犀利上，此文首屈一指。

此文近五万字，为了便于阅读，编者将其分成了“清华的文革”和“清华的教育”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谈了“八八串联会”、“血统论”、“8.24”。

“蒯大富其人”和“两派的理论”五个问题。在“蒯大富其人”一节中，作者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蒯大富的作为和人品：1、反刘少奇，手段卑污；2、为了权力，排除异己、制造分裂；3、抓“联动”，迫害中学生；4、为了权力，反军乱军；5、挑起武斗，下令开枪使武斗升级，双手沾满鲜血。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从“校训”切入，剖析了百年清华的教育：一、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二、蒋南翔的“校训”：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三、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此文诸小节的序号是编者加的，为简洁起见，有些小节的题目编者略有改动。

此文的作者唐伟先生是四川省岳池县人，生于1947年1月17日，1965年从岳池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002班，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8~12月任“八八串联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要头头，1967年1~4月



任“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纵队”主要头头，1969年任校办“同位素厂”厂长。1970年3月~1973年12月，任青海省拖拉机修配厂磨工、团委书记、党委书记；1974年1月~1980年1月，任青海团省委宣传部干部；1980年1月~1984年1月，任兰州大学经济系教师、团委书记、化学系党总支副书记；1984年1月~1987年2月，任深圳大学党

办负责人，在校的最后半年被借调到深圳市政府体改办；1987年2月~2003年1月，调深圳建材集团公司下属二级企业，任经理，其中有8年任六洲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四通集团房地产开发部部长；2003年建材集团公司破产，下岗。现居深圳。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读后

唐 伟

孙怒涛 1960 年从浙江农村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文革中曾担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的二把手，1980 年调离清华。曾表示要写一本《我在清华大学二十年》的书。今年 2 月 22 日老孙给我发来了本《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以下简称《拷问》）。他在卷首语中写到“写作的过程，是对自己良知的又一次拷问，”“我是写给熟悉我的朋友们看的……，这本书，就是我对他们一个负责的交代。”孙怒涛的书，我看得很认真，也想得很辛苦。因为他书中的重点是写清华文革，这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所写下的一切是给同代人看的，引起同学、朋友的联想，以求史料的真实。但我以为主要是为了给后来人看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聪明得太迟，而又老得太快，社会总在轮回转圈。

1949 年，有大学学历的中国人只有 10 万。农村孩子的出路只有三条：招工、参军和上大学。老孙的父母亲含辛茹苦供养独生儿子上学，他们的追求和梦想一直是老孙心目中最有份量的嘱托。老孙也的确是一个能读书、会读书的读书种子，家世清白、父母良善，只要不是过于贫困，哪派势力当政临朝他都有得到教育的机会，没有必要特意贬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把共产党视为恩人，把毛主席当作救星，永生感恩！”记得去年和老孙在北京见面，还谈到他的故乡慈溪，自他以后这些年，还没有一个考上清华的。

小学入队，中学入团，大学入党是老孙父亲的期望，也是他自己梦想的政治前途。我比老孙小几岁，有点政治觉悟也开始于 1958 年。那一年，中学校园的围墙写上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操场上也垒起了一座炼铁的土高炉，解放前在美国留过学的英文老师晚上站在乒乓球台上，在教育革命的口号声中接受批判……。大饥荒的 1960 年老孙上了大学，红专辩论、参观反右展览、学雷锋运动、反修教育，孙怒涛平和地娓娓道来，亲切真实，那是我们一代人的共同体验。

“九评学习”成了孙怒涛政治追求的“滑铁卢”，清华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两大法宝：一是政治课和理论学习中的“灌输”，二是政治运动和学习中的“亮私不怕丑”。孙怒涛就因为暴露思想、迎合组织诱导而被绕进了政治漩涡。他在党员、干部启发下，在学习会上谈了“听到的、见到的、心里一闪念的”如基层干部浮夸、农民挨饿的事例，得到了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的组织结论。老孙追求进步之心严重受挫，大学毕业也未能入党。“人，一旦被贴上政治标签，就很难清洗掉，很难再改变。”老孙的体会可谓刻骨铭心。

蒋南翔校长是一个嗅觉敏锐、处事老道的政治家，这位老清华学人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他对清华自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清华看重学习尖子、体育尖子，关爱学生到“护犊子”的程度。他在“院系调整”的政治改革后从团中央到清华任校长，“反右斗争”的胜利，搬掉了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桀骜不驯的钱伟长，破除了以“教授治校”为代表的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了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仿莫斯科大学建造的主楼就是蒋南翔在清华工作业绩的象征——宏大板结。大饥荒缺吃少钱，主楼降低了高度，缩小了规模。尽管如此，主楼已成地标，足以长久地傲视全国高校，既能彰显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窘况，更是改变了清华的传统，从此尊官重楼：大楼重于大师、高官藐视学人。蒋南翔部长要在学生中培养出副总理的期望自然不在话下。

1965年的夏天，老谋深算的蒋校长一定意识到了什么，从西单大木仓高教部到海淀水木清华丙所，有他频频往返的身影。在“顶风开好万人船”的口号下，他加快了变革的步伐：将65级入学的1649个新生学制改为5年；开办了两个女生食堂；把4、5、6年級的4400名师生调到京郊农村搞一年“四清”，“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三大革命运动战士”；加快了学生中党组织的建设，打破了一般不在一年级发展新党员的惯例；更加密切关注高干子弟的动向，积极发展高干子弟党员……。他是不是想到了：北京城里将再次难以摆下那张平静的书桌了？

1965年9月孙怒涛在怀柔县城关公社白庄大队参加“四清”，一个贫农的儿子在苦寒的农村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他有两大收获：他知道了什么东西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他还知道了同年級的刘菊芬同学是高干子弟，并初步领教了机心难料的刘菊芬的高傲善变。老孙和农民打成一片，努力工作，但是他火

线入党的梦想依然落空了。

如孙怒涛所言，1966年6月1日全国广播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做到了。他老人家延安整风以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批判《武训传》，向已死的陶行知开刀，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集团，经过“反右”运动大规模的整肃，中国知识分子已有别于社会的脊梁和良心，他们失去了受人尊敬的地位，再也不敢奢谈体面，若没有“单位”收留，甚至失去了养家糊口的生活基础。毛泽东攀上了超过秦始皇一万倍的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君临天下，天威难测。他再也不会犯错误了，因为他会用更大的错误掩盖以前的错误。他永远不会失败，因为所有的失败都由党、国家和人民承担。党、国家、人民绝不会相信并接受毛泽东会失败的各种事实。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我们的所有成绩，都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我们所有的挫折，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受到干扰的结果。林彪强词夺理，却符合群众的良好愿望，迎合了领袖需要。于是毛泽东的胜利接着胜利，而我们得以长久地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里。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早向清华党委贴大字报的是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弟。绝大多数同学和孙怒涛一样，“感性上的保蒋和理性上的怀疑蒋一直在纠结着。”感性来自于个人的体味，理性来自中央对北大的说法和类比分析。蒋校长和老师没有理由怨怼自己的学生，除了那些自以为拥有“丹书铁券”可以为所欲为的纨绔子弟，独立思考的传统和谨言慎行的作风，在急风暴雨的狂涛中仍在发挥作用。清华师生从来没有抛弃过理性思考。早在1966年春节，清华党委内部就有“两个中央”的小道消息流传。党委副书记刘冰在5月的晚风中从北京饭店开完市委工作会议，骑着自行车返校，在经过塔院的路上心乱如麻，他有着与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完全不同的心境：革命，真的革到自己头上了？周恩来访问归国，在毛泽东那里弄清了那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是自己，才放下心来步步紧跟。只要野火还没有烧到自己身上，刘、邓壮士断腕，得力的干部彭真、刘仁、蒋南翔惨遭抛弃。随着彭、罗、陆、杨被打倒，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顷刻瓦解。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出来了。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入清华，

清华党委领导立马成为“黑帮”。上级组织的无情无义造成了文革的第一波灾难，群众从来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上级组织有什么理由要把打倒各级领导的罪责算到“造反派”头上？

偶然创造历史。6月的一天，自控系63级樊程在主楼前值班巡逻，一辆轿车停在校门外公路边，一位身着中山服、个子高挑的中年女干部，骑上后备箱中搬出来的自行车，从主楼前进入清华。这个女干部就是工作组顾问王光美。从此清华文革就和中南海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出于偶然，王光美原拟与化902班同学座谈未到，替代她的女同志或许没有说明身份，事后受到蒙骗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质问“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恰巧这天，蒯大富在刘才堂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有关夺权的批语。工作组如临大敌，开启了对刘才堂、王铁成、蒯大富等人的斗争。因为蒯大富在班上有个支持他的“十人小组，”工作组认为是群众基础；因为蒯大富是校刊通讯员，他学习毛著的照片上过1965年的《人民画报》，工作组怀疑他是清华党委埋下来的炸弹。为了“枪打出头鸟，”“反蒋必先反蒯”。仍是偶然的自作聪明，王光美到学生食堂和工友一起为学生打菜，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国家主席夫人亮相。但清华不是桃园大队，知识分子一眼看出这只是王光美令人反胃的作秀。她在清华从此名声不佳。

在工作组的淫威下，校、系、年级、班有组织地将“蒯派”清理出来搞臭：取消这些人的行动自由，禁止他们写大字报，私拆他们的信件，没收他们的日记，逼迫他们写交待材料并加盖手印，甚至监视居住。就这样在全校师生中硬抓出了500多个“右派学生，”硬整出了一个“蒯派”，硬逼出了三条命案。1957年“反右运动”的场景，再一次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巨大的压力下，要么窒息而死，要么爆发而生。清华已经成为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所有的“蒯式人物”统统缴械投降了，纷纷和老蒯划清界线。在绝望中绝食的蒯大富，悄悄被人看顾，来人自称受到江青同志委托。老蒯久旱逢雨，停止绝食，有了生机和继续战斗的勇气。

一、关于“八八串联会”

“八八”的目标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作用和意义就在于它是清华第一个群

众自发的对抗上级指定的“临筹”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只是政治家们鼓惑群众的借口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手段。共产党最忌讳有组织的行为，自外于共产党的组织是不会得到信任和支持的，它的最好的结果是自生自灭。一个共产党员可以犯政治错误，但决不能犯组织错误。“八八”组织松懈，各系负责人联席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唐伟、陈育延、吴栋等几个头面人物，也只是凭着父辈是革命烈士、革命干部；本人都是预备党员，自以为“辫子”较少，能在“血统论”肆虐的环境下与“临筹”的高干子弟过上三两招。工作组也非等闲，大辩论、讲道理输了，搞外调、查三代是他们的拿手活。清华派出的外调人员到重庆渣滓洞查敌伪档案，整了一堆唐伟父亲是叛徒的“黑材料”回清华。工作组撤得太快，这些没用上的“黑材料”工宣队用上了：唐伟在“清队”中被关进“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背着“叛徒子女”的档案材料分配青海。“八八”的纲领很低，只求清算工作组在清华 50 多天里犯下的错误，只求所有无辜的师生和自己不要被打成反革命，“八八”派并不认为“夺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49 年以后大陆政权不是一直在共产党手里吗？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大革命吗？因此完全没有一点夺权接班的思想觉悟。随着工作组撤离，刘、邓垮台，刘邓路线遭到全国、全党、全军批判后，“八八”的头头就失去了追求，迷失了方向。

孙怒涛认为：“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都是好人”，“还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与工作组的斗争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他们就是革命左派。”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这种非黑即白的决定论说法都难以站稳脚跟。居高临下的“平反”，从来是权力部门的一出戏，“八八”掌过一天权吗？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哪个左派是自封和举荐出来的？毛泽东称蒯大富为“五大领袖”，他能领导近半师生员工的“414”吗？毛江夫妇不是在他们去世、下台 N 多年前，就无情无义地将老蒯抛弃了吗？老孙曾咨询过我，老蒯未能加入“八八”的原因和经过。我将经过告诉了他，还说：老蒯不诚实有目共睹，他宣扬的“权经”遭人反感。但《拷问》中仍写道：“鲍长康问：蒯大富能参加‘八八’吗？答复是：他不行。于是讲义气的鲍长康说，既然你们不要蒯大富，那我也不参加了。”1966 年 8 月 23 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支持他拉起自己的红卫兵队伍。老蒯加入“八八”只是

试探能否控制“八八”。至于说到鲍长康的“义气”，我真为老孙既无事实又无原则的吹捧深感脸红。鲍长康聪明好学，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是兵团总部的二号人物。看了李自茂回忆“5.30”的文章，应知道鲍长康是清华武斗中团派的第一线总指挥；看了韩爱晶写的回忆文章，应知道鲍长康手上不仅有伤亡同学的鲜血，更有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的鲜血。鲍长康量窄器小、锱铢必较。工作组“反蒯”，他投降了；老蒯绝食抗争的时候，鲍长康的义气哪里去了？前年老蒯在太原突发中风，一同驾车出游的鲍长康借口上海家中有事，不能留下照顾老蒯，第二天却带着一帮人上了五台山。是冶金系6字班的王文鼎为老蒯夫妇买了机票、送上回深圳的飞机。老孙还能讲出几件鲍长康讲义气的事情？

《拷问》还写到：唐伟“在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同时没有为蒯大富等蒯派进一步平反，这是很遗憾的。我真为唐伟可惜了！他错失了一次站在文革潮头、引领清华文革、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极好机遇。”写到这里的老孙，头脑未必清醒：“旗手”江青只敢承认自己是条老毛让她咬谁就咬谁的“忠狗”，老蒯说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比起那些奉旨造反、投机造反的人，唐伟只是个跪着造反的学生。唐伟当时说过：“宁可右倾，不当阿斗。”他是糊涂啊！

二、关于“血统论”

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分清敌友，实际工作中执行着一条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土改时，由新政权派出的工作队根据每个家庭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而定。其中难免错划和偶然的因素，时代和社会造成的贫富悬殊被指控为个人行为，犹为荒唐处是一次定成分就万劫不复、殃及子孙。毛泽东终其一生不懈地奉行井冈山当“山大王”时的杀富济贫，并乐此不疲。人为灾难不断，举国难安，内斗内耗无休无止。阶级路线中的“重在政治表现”只是留给掌权者解释、定性和灵活掌握、生杀予夺的借口，也成了“政治犯”由来的依据。

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八八”的几个头头第一次被周恩来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他谈得最多的是自己的身世：

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到父亲一辈破败了，我父亲只是个小职

员。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对我说、你的家庭出身可以填职员。我还是填官僚地主家庭。

我出生于剥削家庭，我入党时就填写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为什么现在要改呢？你们能因此而说周伯伯就不革命了吗？有人劝我也改个名，我周恩来在受到国民党政府悬赏通缉的时候也没有改过名，为什么现在要改呢？我们政协有一个老先生，“五四”以后为了表示和旧社会一刀两断，不要姓名了，叫“无名”，别人叫的时间久了，他的姓名成了吴铭。我今天提到他只是为了说明革命不革命和姓名、和家庭出身没有关系，你们可千万不要去找吴铭老先生的麻烦啊。

他还谈到，为了给铁路让道，搬迁周家祖坟的事。

他说自己1949年后再也没有回过淮安祖籍，回到老家见不见那些破落地主家族的亲戚长辈？不见不好，见了之后会不会给当地政府和群众造成压力？当地政府曾报告将我的祖屋修成“周公馆，”我没有同意，我对当地政府干部说，我真是从那间屋子里生出来的？你们若要坚持修“周公馆”我也只好同意，但是你们必须在门前挂上我写的一段话：这是一个罪恶的剥削家庭，这个家庭出了一个不肖子孙周恩来，他背叛了这个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你们若是同意挂上这段话，就去建“周公馆。”

.....

家庭出身不仅阻断了许多普通人参军、招干、升学，甚至嫁娶的生活出路，而且也让贵为总理的周恩来深深地心存忌惮。邓小平也从未回过老家，广安协兴乡传出一句话：“龙归大海不回头。”真实情况邓家是土豪。只有厚黑如毛，才会把富农家庭成分改为中农。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自于阶级斗争学说。“血统论”是这个错误理论开出来的“恶之花”。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口号也传到了清华校园。高干子弟大多持支持态度，以此作为仗势凌人的依据，他们象被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一些早就想着攀龙附凤的农村学生，可悲地充当了抄家整人的打手。前些日子在1964级校园网上，读到了贺鹏飞班上一位同学的回忆文章。当年他热切地盼望成为贺鹏飞的同班同学，跟随贺鹏飞，他幸福地参加了“8.18”毛主

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典；他还参加了“8.24”的行动……。四十多年后他依然沉湎在铁杆粉丝的疯狂激情里，一遍再一遍写到：“王子永远是王子，贫儿永远是贫儿。”这种农村版“血统论”耸人听闻，这种顽固的愚昧或许是清华教育深层次的悲哀。

清华历来看重学习成绩、体育成绩，平时高干子弟也行事低调，注意搞好同学关系。1963年贺鹏飞高考落榜，贺家也只是通过荣高棠找到蒋南翔，让贺鹏飞到清华附中补习。第二年贺鹏飞作为体育尖子（北京市中学生铅球比赛第一名），根据规定降50分被录取到机械系。在“血统论”的煽动下，在工作组的讨好下，在权力和荣誉的诱惑下，不少“红五类”子弟晕头转向了，丧失了理智。“血统论”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伤害深重而久远，可是首先受到伤害的却是鼓吹者自己。

三、关于“8.24”

“清华大学红卫兵”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它是在刘菊芬的“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它有一个抱团的群体，带着高傲和神秘。它有一个以高干子弟作为核心，吸收了多数中央候补委员以上、少将军衔以上、省部级干部以上的子女“拚爹”排座次，“红五类”子女为侍从、为拥趸的豪华阵营。这帮“听话的好孩子”，习惯了保姆的教导，王光美说，他们成立了“八八串联会，”你们就不能成立“八九串联会”？于是清华就有了“八九串联会。”“8.24”行动也是在王任重指点下搞起来的。他们大权在握、体面光鲜、思想贫乏、毫无创意，他们的大字报除了泄露上层斗争的动向，就是暴露上层斗争的隐私。“8.24”行动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壮举。

“8.24”行动是一次欲盖弥彰的闹剧。1966年8月19日清晨，唐伟、吴栋、陈育延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中午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王新民、袁塞风等高干子弟跟着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8月21日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高干子弟带动下，矛头对准王光美，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校外赶到清华看大字报的人也越来越多。“8.24”傍晚，贺鹏飞等人在王任重的提点下，召集了十二个院校的红卫兵拥进清华，撕毁了主要是他们自己揭发批判刘少奇、王光美

的大字报。为了掩盖他们不光彩的政治行为，他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推倒二校门、抄家、抓人，把“黑帮干部”、右派教授关到科学馆、二教毒打。

以下摘自罗征启老师文章《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记1966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2008年8月20日修改稿）：

8月24日晚上，……几个人把张慕萍架到审讯室，我刚想看一下，就挨了一下抽打，“不准看！”我就听审讯室里很重的抽打声音和张慕萍的呻吟。过了一会一学生从审讯室里出来，大声说：“张慕萍想逃过群众的专政，被我们抓到了，现在他就要从审讯室爬出来……”这以后，走廊的南端又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几个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到喊声：“使劲！”……我心理难过极了，这是我们的学生吗？怎么会这样！接着审讯室内忽然传出一声呼叫：“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接。我们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面15公分，不能超过20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刚刚“整理”好，贺鹏飞就上来了，我还来得及偷看了一眼，果然很象贺龙元帅，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审讯室里的人象是汇报什么。贺鹏飞从我面前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的姿式，已经把头顶在地上，他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他这一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我被带回生物馆，从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连水都没喝一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革命群众”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黑帮分子们排成一排，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x x x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一下。”第一个是钱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语以后，那个学生又喊：“你还得加一个‘大右派’，重来！”于是钱先生又来一遍，加了一顶帽子，领了口粮，站在原地等候。这时

我认出这个学生好像是工程化学系的，以后工化系的辅导员告诉我，他姓杨，是个大个子。“第二个！”他喊。第二个是我，我没有加多什么就过了关。第三个刘小石，也过了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下午，又有了新花样，一个叫马楠的学生带了两个“随从”，来到生物馆，审问我们这些人。听说这马楠是军人后代，绰号叫“马楠将军”，到处打人抄家。第一个叫走了钱伟长，……过了一会钱伟长回来了，我看他后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忘了是第几个，叫到我。我走进审讯室，马楠嘴里叼着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付兵痞模样，一边站着一个瞪圆了眼睛的大汉……

罗征启讲了这样几件事：(一)、“8.24”是一起卑劣的政治事件，领头的干部子女要毁掉的是他们在巨浪突袭晕头转向时贴出的揭发自己父母的大字报。为了掩盖其政治目的，他们打着“破四旧”、“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推倒二校门，四处抄家，毒打“右派”、“黑帮”，以转移群众视线。(二)、张慕萍、罗征启、钱伟长等人肉体被殴打，人格遭凌辱，而凶手是他们的学生、我们的同学。罗老师文中点到的贺鹏飞、与我同系同年级的杨同学、水903的马楠等人乖戾凶残的整人手段和电影中的坏人毫无两样，谁能相信他们只是二十出头、大学低年级的学生？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听说过他们有过任何忏悔和道歉。他们当年的恶行和至今无悔的厚颜，将自己的人格污点越搞越大，这种自作孽行径，已将自己变成了清华历史上永驻难改的地痞流氓。

时任北京新市委二把手的吴德，在他的回忆书中竟然指认蒯大富是清华“8.24”的肇事者。那些说违心话保官、有了权就栽赃的“老革命”们，我要对你们说一句：“我鄙视你们！”如孙怒涛所言：“恐怖、即使披上红色的、革命的外衣，也涂不上正义的色彩。”

四、关于蒯大富

谈论清华文革，蒯大富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蒯大富是江苏滨海一个贫农家的孩子，1963年考入清华工化系902班。在工作组的高压下，可以看出他的执着和坚韧。他在大礼堂前和以势压人的薄一波辩论，展示出了他的机敏和口才。蒯

大富在“反蒯”斗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我曾在给周泉纓的信中说：这是一个20岁的青年学生的骄傲，也是清华大学的骄傲。蒯大富有政治追求，又受到校党委的重视，为什么到大三还没入党呢？保定要宝忠写的《蒯大富传》中讲：一次老蒯的父亲来校看他，他却对同学介绍这个苏北老乡是村里人。后来，我们大一辅导员上党课时讲，有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让我特别反感并心生警惕的是不断传来的“蒯氏权经”：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谎话越大相信的人越多，谎话的作用在于它被戳穿之前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后来陈育廷对我说，“蒯氏权经”有二十多条。

孙怒涛的《拷问》中说：“如果‘八八’真的能承认蒯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把依旧处于困境的蒯大富收罗麾下，我想蒯大富对‘八八’会心存感激的，蒯大富也不见得非另立山头，拉出一个‘井冈山红卫兵’来不可。”老孙如此分析和真实相差甚远，连蒯大富自己都不会相信。老蒯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很快转变为权欲野心，在江青、张春桥、戚本禹的教唆下很快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走过了一段疯狂的夺权道路。

1966年9月2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它的发起人是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选中井冈山这个名称的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小女生，十六、七岁的刘刚，她后来成了蒯大富的恋人。“八九”红卫兵分崩离析，“红旗”、“延安”等红卫兵和“红教联”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但“井冈山”的成立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井冈山”的目标明确：批判工作组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八九”、为蒯大富彻底翻案。尽管如此，井冈山的人数在“三总部合并”前也只有数百人。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9月底分裂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分裂的原因是在打倒刘、邓后，继续革命的方向方式方法上。“八八总部”认为“井冈山”批“八九”是矛头向下，不符合“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和“革命不分先后”的《十六条》精神，所谓为蒯大富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有泄私愤和树立个人权威的苗头。“临时总部”认为斗黑帮是大方向，重点批判蒋南翔和清华党委代表的资反路线；“八八总部”认为重点是批判王光美和刘、邓为首的资反路线。但周恩来特别告诫过：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所以主张向中央请示、听中央安排。井冈山主张彻底为蒯大富和“蒯派”翻案，其思想基础发展成为“大翻个

儿”的口号和“理论”。越来越多的学生对校内派系斗争厌倦，对运动发展茫然，纷纷外出“大串联”。

蒯大富篡夺清华群众组织和“首都三司”的领导权，既是文革乱象，更是中央文革支持的结果。

“三司”的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全国夺权斗争高潮叠起的1967年，打着“三司”旗号的一个红卫兵小分队，就能在一个省或市里掀起巨浪狂涛，蒯司令的一个电话就能决定一个省地级干部该保或是该反。明明是“二司”的“北航红旗”，因为韩爱晶和蒯大富的亲密关系也在全国各地设立“三司联络站”。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回忆文章中错误地写到：“早在八月下旬，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兴起，并逐渐联合起来。由于观点不同，大学分为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中学则以‘西城纠察队’为主成立了第三司令部。”真实情况是这样的：“8.18”后不久，清一色的干部子女红卫兵联合组成了“一司”，政治观点不重要，父母级别和相互关系才是重要的。清华“八九红卫兵”参与组建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后来被称为“一司”。一部分没有被邀请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不愿意了，联络了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准备成立“二司”。戴维堤、韩爱晶为头头的“北航红旗”，朱成昭、周永璋、王大宾为头头的“地院东方红”和“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在“二司”筹备人员的邀请之列。政治观点不重要，凡未参加“一司”的红卫兵组织均可参加“二司”。1966年9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和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后，地院周永璋找我商量，两校牵头找清一色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第三个司令部。“北航红旗”是保工作组的，留在了“二司”，这也是后来“天派”、“地派”由来的原因之一。“三司”成立之初，只有14个院校，以“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地院东方红”人数多，又是发起单位，1966年9月5日“三司”成立，地院和我们派人出任了正副总指挥。国务院将几个红卫兵的司令部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其中一座大殿就是“三司”的司令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曾经给我们当了几天顾问。1966年10月6日发展壮大了的“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蒯大富由中央文革点名作为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那时“井冈山”还未加入“三司”，它加入“三司”是清华“三总部”合并以后的事了。

“井冈山”的历史使命明确而简单，就是充当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三司”是各校红卫兵派驻人员组建而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靠边，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受惊吓而自杀后，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不断减少，尽管他精力旺盛、勤勉有加，但也会力不从心。国务院设在西安门大街22号的红卫兵接待站逐渐被中央文革渗透和掌控。蒯大富掌控“三司”应在清华“三总部合并”前夕，因为那时清华派驻“三司”的代表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二把手陈育延。

1966年12月周恩来、陶铸、江青等中央首长多次讲话，要求各校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师生员工大联合的呼声也很高，头头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主动找到老蒯，表示放弃争一把手，都用“井冈山”的名称，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井冈山”、“八八总部”、“临时总部”各推举9、7、5名总部筹备委员。就在达成协议的第二天（12月19日）清晨，蒯大富派人突然强占了“八八总部”控制的明斋广播台，单方面公布了20个总部筹备委员的名单。孙怒涛在《拷问》中写到：“在‘井冈山红卫兵’里，总部核心主要是那些与蒯大富有过共同患难经历、并且开始就参加了‘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人物。其中有好几位都是蒯大富同班或同年级蒯派。这些人这次都被蒯大富推荐上去了。”“我被蒯大富提名为总部委员，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他事先没有给我透过口风，我也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从老孙的回顾中，能看到是“三总部合并”吗？那是蒯大富私自任命干部，拉帮结伙。当时有几个造反的头头在乎程序正义、手段光明？对蒯大富的卑劣行径中央文革没有任何干预，我甚至猜到，其中有戚本禹的共谋。清华文革已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大辩论时期了。几天后我和朱德明、许胜利宣布退出了“井冈山兵团”总部筹备组。

“蒯司令”获得了“三司”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权力，他的造反精神更足了，更加狂妄了。毛老人家正在部署迎接“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自然乐于见到几个如同蒯大富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将专干“脏活”，以搅乱天下。全国学校已停课半年，“大串联”、“长征队”、千多万红卫兵参加“北京朝圣”……工农业生产已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把人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和最狠毒的仇恨煽动起来，毛统帅号召全国大夺权。权、权、权，命相连。且看蒯大富的突出表现：

1、反刘少奇，手段卑污

“12.25”行动，是“三总部”合并后“井冈山兵团”第一次大行动。6000余名清华师生打着横幅游行，在“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中，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满了长安街。十月以后，刘少奇靠边站了，但还是中央首长。1966年12月31日晚上，周恩来把“井冈山”的头头召集到人民大会堂。虽然我已经退出了总部，蒯大富仍然通知我参加了接见。周恩来明确表示不支持“12.25”行动的作法：“你们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贴在北京街头，我如何向外国朋友解释？他还是国家主席嘛。”“你们要求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判，为此我专门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她写书面检讨，背靠背的批判嘛。”回到清华，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蒯大富篡改周恩来的讲话：“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斗，但同意把她揪回来批”。我上台去和老蒯争吵了起来。参加接见的总部委员有十多人，当时、以后、现在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证，我或老蒯究竟谁在说谎。

“智擒王光美”的“1.6”事件，当年《井冈山报》发行了数十万份，“捉鬼队”把他们的战绩宣传得沸沸扬扬。他们利用的践踏的是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对女儿的爱心。王光美被抓到清华，受到侮辱，面对暴行她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反而得到师生内心的敬重。那天晚上天刚黑，王光美被绑架推拥在西大操场体育馆的观礼台上，台上台下是黑压压的围观群众。我和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孙岳通过电话，冲上观礼台去传达总理的四点指示，看到王光美被人推搡着，鞋掉了一只，头发零乱，竟能让我见到人性到了绝望处的微光。许多年后在深圳，老蒯和我聊起那天晚上，放王光美回去之前，蒯大富去见王光美。老蒯问：“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老蒯自得地说：“我就是你要批倒斗臭的蒯大富啊。”王光美赶紧站起来要和老蒯握手，被老蒯拒绝了，“我怎么能和这个臭婆娘握手呢？”我不无调侃地对老蒯说：“所以她后来通过陈希同把你赶出了北京。”这种充满小鸡肚肠的阴谋伎俩，称得上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吗？从这事件后，我明显地感到，蒯大富的心中已不再有阳光。

1967年4月10日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周恩来的退让，说明中央对刘少奇斗争的升级。后来老蒯对我们说，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不知是哪个小子的鬼主意，不过挺解气的。这个3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

被挂上打了×的黑牌子、跪在主席台前的“黑帮分子”，包括彭真、刘仁、叶林、蒋南翔等各级干部有300人之多，他们都和清华文革有关？真的是必须置于死地的仇敌？杀人不过头点地，以革命的名义对政敌极尽羞辱践踏之事，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你老孙就坐在主席台上，我很想在《拷问》中看到你当时的感受和今天的认识，你让我失望了。

刘涛是刘少奇和王前的女儿，跟着工作组干过错事。刘少奇垮台了，蒯大富用工作组修理他的方法修理刘涛：你不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吗？现在毛主席说刘少奇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你若不和刘少奇划清界线，不站出来揭发批判刘少奇、王光美，就是反对毛主席。1966年12月江青还专程到清华找刘涛谈话。随着对刘少奇斗争的不断升级，刘涛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最龌龊的中国成语叫“大义灭亲”，它挑战人性，制造人格分裂。在这里我要说几句题外话，我们工化系工作组的副组长张茜薇是革命烈士张太雷的女儿，也是邱心伟同学姑姑的亲家。有一次我请邱心伟领我去见见张茜薇，邱心伟说老太太身体很不好，只要有人提到文革、清华就全身痉挛。我不知道她受过何种刺激，至今心灵的拷问、煎熬还折磨着她。我们这些人都干过错事、蠢事、需要用一生为青春埋单，去自我救赎。

在打倒刘少奇的大戏中，还有一段重要的插曲，就是陶德坚的“红教联”为陈里宁翻案的事情。陈里宁恶毒攻击刘少奇，因为有精神病被关在北京安定医院里。“红教联”和“井冈山”等四、五个群众组织把他抢出来，让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还将他的事迹编成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出，大量印发《新编“狂人”日记》。并于1967年1月6日晚组织百余人冲击公安部十三局档案室，抢夺陈里宁的档案。在群众和荷枪实弹的守卫对峙的紧张时刻，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令守卫让陶德坚听电话，最后让她带走了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翻案，就是为打倒刘少奇造势，为给刘少奇定案增添筹码。陶德坚只是土建系的普通教师，她怎么知道陈里宁并这么感兴趣的？她怎么找到安定医院和公安部十三局这个保密单位的？她如何下决心挑头去抢档案的？为什么也挑选了1月6日与“智擒王光美”的“捉鬼队”同时行动，让周恩来无法兼顾？陶德坚死也不说，在她的《风雨人生》中并没有临终忏悔。诡异的是陈里宁不仅狂批《修养》，也批判《毛选》。批准逮捕陈里宁的人正是老蒯的“铁哥们儿”公安部长谢富治。“窥渊鱼者

不祥”，陶德坚惹火烧身自是难免。闹剧收场了，陶德坚当年就受到批判。最后还是老蒯的“团派”保护性的把陶德坚看管起来。

我的这些认知，也是来自于陶德坚临终前的自传《风雨人生》。带着诸多疑问，2011年的某一天，我邀上蒯大富拜访了罗征启。虽说陶德坚对分管过土建系工作的罗征启十分反感，但对罗夫人梁鸿文却有好评。在罗征启的办公室里，我们三人喝着上好的铁观音，聊了整个下午。陶德坚的自传、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丽聪明、务实自信、肯干能干、坚强而不落人后。陶德坚在香港长大，外祖父娶了七、八房姨太太也没有养出一个男丁。陶德坚的父亲出身贫寒，因长相英俊、学业有成而入赘陶的外祖父家。陶德坚是家中的大小姐。刚解放她就只身北上求学，被铁道学院录取，开始了她在北京的大学生活。在与该校曾经是地下党的一位干部若有若无的恋爱关系中加入了共产党。院系调整后该校迁唐山，陶德坚进清华土建系。每一个人都自带风水命数，每一步选择都在决定人生际遇。陶德坚急于成功的取巧心态大于追求进步的理想；她成了政治运动中的弄潮儿，却迷失了本来应有的政治信仰；她受到母亲、丈夫、女儿的深爱，而她却似乎只爱自己；对共产党、“井冈山”、“红教联”这些和她相关的组织并无认知和认同。陶德坚或许是一个称职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象痞子，却在清华文革中成功地出演了一个痞子的角色。陶“大小姐”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和老孙有太多太大的不同。奇怪的是孙怒涛在《拷问》中，说他的“怒涛战斗组”和“红教联”是“一路货色”，陶德坚和孙怒涛一样都是组织上眼中的“差质生”，而其实陶德坚“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以“大小姐”的傲气，定然不会对老孙的巴结认同承情。

2、为了权力，排除异己、制造分裂

“井冈山兵团”成立，没有经过任何程序，总部筹备委员就成了总部委员。蒯大富志得意满，任人唯亲，唯我独左，怀疑一切，自我膨胀。他编出了自我吹嘘的《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同学戏称之为《蒯选》。有权有钱的老蒯下令，一下子印了50万册。江青为此批评老蒯：你蒯大富也太狂妄了，我还没出选集，你倒先出了。由于江青的干预，《蒯选》发行量不大，存世就更少了。1967年1月唐伟、沈如槐和宿长忠、孙怒涛、陈楚三、刘万章等人先后成立了“井冈山兵团”

内的“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天安门纵队”、“东方红战团”和“中央警卫团”，“五纵队”要求总部整风。1967年1月4日陈育延贴出大字报：“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作为的”，尤其是朱德明在整风大会上发言：“要用100度的开水给蒯大富洗澡。”大规模的“反唐战”开始了。刘泉说：“唐伟是机会主义者、是叛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言人，想煽动群众分裂，整垮‘井冈山’总部”。“在我校，对待‘井冈山’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蒯大富说唐伟是“托派”，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八八”的建立是刘、邓、陶的一个大阴谋。陈家国在大会上拿出半年前记的日记，历数一些“蒯派”人物在工作组压力下的投降、软弱，包括刘泉反蒯的大字报。“反唐”暴露了造反派头头们自伤自残的真实嘴脸。由于中央文革的干涉，老蒯也发现“大方向错了”。“反唐”嘎然而止。

蒯大富“反唐”的本意是搞臭唐伟，搞臭“八八”，争取更多的师生臣服于“蒯派”的杰出代表蒯大富；给那些敢于和蒯大富作对的人一个教训。事与愿违，“反唐”的结果是老蒯制造了更多的反对派，这也表明了“井冈山”内部深刻的裂痕，清华团、四两派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孙怒涛旁观者清，在《拷问》中写到：“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手握大权以后，以敌对阶级的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清除异己，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都是一样的行径。”这段话极有见地。1966年10月以后，周恩来多次提醒我们：“当你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受压的时候，我们不担心你们会犯错误，现在你们开始掌权了，到了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那时就曾发奇想，很想问一问周恩来：“周伯伯，是不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掌权后就开始犯错误了？”只是胆量不够大，也没有合适的机会，腹诽而已。工作组的副组长、冶金部副部长、辽沈战役的大英雄周赤萍，在清华主席台上的表现太让师生反感了，活现了“打天下，坐天下”的权势者将学校踩在脚下的丑态。

群众组织内部分歧的深层次原因，是对文化革命进一步展开的诸多疑惑。刘、邓、陶垮台了，下一个该打倒谁？康生？陈伯达？周恩来？中央文革？“穿军装的刘邓路线？”都在被怀疑、被炮打的名单之中。造反派的“坏头头们”像进了赌场日渐红眼的赌徒，唯恐右倾而不能立新功。蒯大富没有闲着，他也要先安内、后攘外。有了派系一统，就有了号令清华的实权；有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和点

拨，就有了“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反唐”不对，但为了“实权”和“虚权”，都是必须的。那个干了错事、坏事须自责、道歉、悔过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内疚只是中了黑《修养》的毒才会有的表现。

3、抓“联动”等，参与对中学生的迫害

毛泽东未必懂得“蝴蝶效应”，但宋玉的《风赋》却烂熟于胸：“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红卫兵一出现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的一封信把这帮决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狂热青年学生捧到了天上，通过八次大接见、大阅兵，红卫兵成为了运动，成为了全国造反学生的代名词。通过不须花钱的“大串连”、“走新长征路”，这股洪流浩荡喧腾，“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助他实现了“天下大乱”的丰功伟业。红卫兵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继续革命”的“血统论”，也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所谓“右派”，就是“黑五类”、“黑八类”、后来还加上“臭老九”。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八旗子弟”血统高贵的蛮横，“义和团”暴民的愚昧，还有着“党卫军”冲锋队员的不可一世的残忍。暴行在“红八月”里达到巅峰。

周恩来为了保护知名人士，支持成立了“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东城区的高干子女少一些，随后也成立了“东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在《实话实说西花厅》中回忆说，“周总理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曾派国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8月31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事实上纠察队按国务院办公厅的指示把极少数知名人士保护起来，在街道居委会和街道派出所的安排和挑唆下抄家、打人不误，恐怖和血腥依旧。

“西纠”、“东纠”的崛起，刺痛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老”红卫兵的自尊自大：他们算老几？居然骑在我们头上纠察我们？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101中学等海淀区的红卫兵骨干发起成立了“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独领风骚，“西纠”、“东纠”中的父母级别不高的“红五类”子女立马贬成了“土联动”。“联动”矛头是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尤其看不起“戏子”

江青和“十七级大干部”戚本禹。“联动”没能猖狂多久，“红司令老毛”轻轻一挥手，“联动”就惨遭围剿。

清华“井冈山捉鬼队”充当了打人抓人抄家的重要打手，北京体育学院成了临时看守所，那帮四肢发达的体育尖子成了最趁手的帮凶，谢富治把持的公安系统给予了全力配合。那些父母已经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弟，在阴谋阳谋的搏杀中终于输光了全部政治资本，在“上山下乡”之后，就一蹶不振地——废了。

一位女一中初三班的学生在当年给我的信中写到：

清明节，我被体院的王八蛋莫名其妙地关进了局子里。1967年4月22日晚上，我们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人员接见后“大赦”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理曾说：“你们这些人中也许有的人父母被斗了，被打倒了，他们不跟主席走了，你们还跟吗？党和国家会抚养你们的。”顿时掌声雷鸣，被接见的我们全哭了。我回到家以后父母都没说我，只是爸爸在第二天早上上班前，给我留下一个条，叫我好好闭门思过。

我的一位“捉鬼队”的同学，一次闲聊偶尔谈到当年抓“联动”事情，脸上不无自得。后来我看要宝忠的《蒯大富传》，讲到叶志江带人去抄邓拓的家、抄调查部长孔原（“西纠”头头孔丹是许明、孔原的儿子）的家。再翻看了叶志江相赠的大作《走出文革》，书中对此事并非只字未提，只因自己粗心眼拙而失察。后经叶公友情提示，果然在第126页中找到了数百字的叙述，叶志江也承认“这毕竟是一种侵犯人权，无视法律的行为。”我再次向叶公道歉，并修正看法：如何教我能不相信他走出了文革？“没有一滴雨水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释放“联动”分子那天，江青特意抢到周恩来之前放人示好，她也害怕得罪太多的军中大佬。周恩来雷霆雨露皆恩来，三言两语就收伏了这帮天真可爱的“小魔头”。只是至死难悟的蒯大富及“捉鬼队”，从头到尾被毛江夫妇当枪使，惹上了杀父夺妻断子绝孙的家族血仇，无缘无故得罪了无数的“红色豪门权贵”，通俗话叫犯了江湖大忌。老蒯到底是农民的儿子，至今还傻傻地检讨自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去年校庆后，清华附中的几个朋友请我吃饭，我把老蒯也邀请上了，由于事先没给主人打招呼，见面后两位男主人还给面子，两位

女主人当下就脸色不好看了。老蒯讪讪吃罢，中途离席。女一中那位朋友曾告诉我，当年北京西四“九三学社”所在地是“西纠”总部，院子里养了两条狗，一条叫“戚本禹”，一条叫“蒯大富”。“西纠”的“国防绿”们抄家打人回来，不是踢“戚本禹”几脚，就是揍“蒯大富”几下。“蒯司令”从此恶名远播，血仇难消。老蒯若没蹲满17年大牢，定难过上如今安稳的生活。

4、反军乱军，还是为了权力

1966年12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没几天，蒯大富就派人去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把徐元帅的保险柜弄到清华。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总部会上，蒯大富安排人连夜把保险柜运往天津用氧气割开，还说周总理下令归还保险柜的指示出了北京就不好用了。这件事似乎后来无人追究，我曾当蒯大富的面指控过他，他却没事的人一样。那么多人参加总部会，参加抄家抢劫的人也不会少，几十年来也没听说有人揭露这件事。1967年1月11日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后还担任了组长。蒯大富当时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敢这么干？抄来的东西给了谁？蒯大富曾将刘志坚抓到清华，关押在1号楼506房间。鲍长康曾持关锋指令窜到北海舰队。

蒯大富反军乱军的手段，不同于各地极左组织和“三支两军”部队的冲突，蒯大富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下，锋芒直指军中德高望重的老师、老将。根据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的精神，“穿军装的刘邓陶”就是第二个被打倒的目标。1967年7月蒯大富在他召集的“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上发言：“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

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受中央文革差遣，去四川揪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元帅，地院的红卫兵捷足先登，抢在北航之前将彭元帅弄回了地院。地院的头头朱成昭是一个人格健全、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和囚禁中的彭元帅几番长谈下来，得出结论：彭德怀是正确的，毛主席错了。彭德怀在地院没有受到折磨，让江青心中不爽。江青指使韩爱晶挑起了一场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的武斗，韩爱晶趁乱把彭元帅抢到了北航。韩爱晶下令不许任何人与关押在地下室的彭元帅谈话，不断地批斗、不断地折磨他，还亲自动手搯彭元帅的耳光。韩爱晶的好友告诉我：韩爱晶在给中学老师的信中，对彭元帅充满敬意。就这么一个不缺少见解却毫无人性、人格的“红卫兵领袖”，不仅受到毛泽东称赞，

说韩爱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也得到了当年仅一面之缘的“414”二把手孙怒涛的信任和吹嘘。在深圳饭局上，凡是见过韩爱晶猥琐表现的清华校友，都为你老孙推崇韩爱晶的美言和相信韩爱晶的谎话而感到脸红。

清华百年校庆前后，蒯大富给我看一条韩爱晶发给他的短信：“毛泽东有错误，也整过我们，但是我们对他永远也恨不起来。有时想到主席，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我问老蒯，你相信老韩还为谁能流出真诚的眼泪吗？老蒯一笑置之。

“揪军内一小撮”止于武汉“7.20”事件。在这个擦枪走火就能引发“辛亥革命”、终结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伟大城市，中央文革那几个“小爬虫”终于激起了工人、军人的巨大反弹，荷枪实弹的军人步伐迫近了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匆匆离开武汉飞往上海。他自己点燃的野火，猛然窜到他的身边，几乎灼伤他的皮肤，他就一定能控制住所有的老军头？闯了祸的陈再道跟随周恩来回到北京，没听说受了处分；风头正劲的王力、主持全军文革的关锋，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取王、关、戚政治生命以安军心，毛泽东耍这种小手腕，只在一念之间，用不着精心谋划。

毛泽东从“5.16通知”的部署掉头而去，蒯大富被“放了鸽子”。“井冈山”对外作战部又该向谁开战？军事动态组收集的材料如何处理？设在全国各地的反军联络站如何收场？蒯大富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也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1967年8月16日周恩来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年出去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了倒忙。”几天后，王力、关锋倒台了。这是老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之前，老蒯干什么对什么，尽管行事下作、手法卑鄙，大方向总是正确的。这之后，老蒯干什么都不对了，他成了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添乱的“小混混”。

5、挑起武斗，下令开枪使武斗升级，双手沾满鲜血

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沉浸在主楼广场30万人批斗王光美带来的风光无限的喜悦中，以“纵队派”为主的反蒯力量自发地汇集成了一个足以与之抗衡的派别。1967年4月14日，一个以干部问题为论战焦点、以反对蒯大富独霸清华权力为目标的“4.14总部”成立了。蒯大富通过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控制的明斋广播台，撕毁三总部联合协议，组成了一个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拒绝监督的强权机关，逼走了唐伟、朱德明、许胜利；掌握权力的蒯大富唯我独革、野心

膨胀、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逼出了“纵队派”，逼出了“414”。工作组“反蒯”，是强权压制民主；“414”反蒯，是反对蒯大富的专制。“井冈山”总部委员孙怒涛、王良生等相继参加“414”，蒯大富用他的强权培植起了一个秉承公道正义的强大对手。对于广大的师生员工来讲，求得安全、避免恐惧，远胜于对权利的追逐。

周恩来是何等聪慧精细的人物，他长于未雨绸缪、枉尺直寻，总能棋高一着化解危局。他痛斥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的卑劣伎俩。对于蒯大富这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毫无信誉的权迷，周恩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召开仅仅几个小时前的凌晨寅时，他通过谢富治宣称不能参加大会，还建议大会延期。“团派”暴跳如雷，老蒯重重地“闪了腰”。尽管周恩来曲意逢迎毛泽东、谀侍江青，领衔“刘少奇专案组”组长，遭人诟病，却能时时处处表现出是无奈的违心所为。总之，老蒯对于这位最早为他平反的恩人尽管恨得牙痒，却从来不敢公开挑衅。去年4月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问世，封面上的照片竟不是“爷爷一样”的毛泽东，或最疼爱他们的江青阿姨，而是老蒯就教于周恩来的照片，我以为这两个脑瓜灵光的家伙是慑于周恩来的人格力量。

1967年5月30日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毛泽东说的“蒯大富可以当清华大学校长”，成了老蒯眼前晃来晃去的画饼，也成了蒯大富终生抱憾的清华情结。

“414”成立不到一年，人数发展到7000，足以抗衡老蒯的“团派。”进入新年，66届的同学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两派抢地盘、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愈演愈烈。1968年3月27日北京大学发生武斗，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打跑了对立面“北大井冈山”，中央文革小组立即表态支持聂元梓。蒯大富从中受到启发，决定通过武斗打垮、打跑“414”，实现独霸清华的野心。所以我指出老蒯是清华武斗的挑起者、责任人，老蒯对此指证供认不讳，多次在同学面前说：“如果我当初不同意打，（清华武斗）肯定打不起来。”

清华武斗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1968年7月27日结束，又称之为“百日武斗。”两派的冲突从4月23日的“旧电机馆战斗”到4月26日的“8号楼战斗”、“2号楼战斗”，4月29日“414”“百人抢粮”，5月2日“土木馆战斗”，发展到近千人参加的“5.30大武斗”。血淋淋地演了一出毛统帅倡导的“文攻武卫”的大戏，遵从他的教诲将派别之争演变成了“国共两党的斗争。”“5.30大

武斗”之后，冷兵器过时了。老蒯下令开枪，而且是五支同样的步枪瞄准同一个目标开枪，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和良心的谴责。老蒯还下令格杀凡是走近科学馆的人。想到那些在武斗中无辜死去的鲜活生命，我们是否应当象鲁迅一样“出离的愤怒，”写出一篇又一篇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414”没想到自己这一派竟然能支持这么久，架在主楼顶上的“九头鸟”高音喇叭，把播音员冯克庄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到了数公里之外，可是科学馆成了“团派”包围下的孤岛。两派的头头和小兵都生出了一种无力感，武斗的残酷和血腥超出了双方的想象。有一次孙耘对我讲：当年若知道老四救出科学馆的人就打算撤出清华，真应该制止吴慰庭炸毁老四通往科学馆的地道，让老四跑了算了。陈育延是反对武斗的“鸽派”，打算脱离战场回家，5月19日施然路经老四防区，万料不到会被俘进了科学馆。蒯大富心中忐忑、不无悔意，却受到“鹰派”的巨大压力。5月30日“团派”火烧东区浴室时，陈继芳还曾从九饭厅提来两麻袋辣椒干倒在火里，后来见团派战友用手榴弹在水木清华炸鱼吃，心中受到刺激，回沈阳家中养病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团、四两派鲜血写成的恩怨情仇难以消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利用的、有罪的学生被判重刑，而巨凶首恶的僵尸依然被万民膜拜；老邓的“宜粗不宜细”，陈云的“两派都不用”，成为了社会禁绝反省、抛弃公正的毒瘤。被染上这种病的人，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人生。

去年，正在编写《清华蒯大富》的韩爱晶，造出了一个他和地院王大宾在1968年5月30日后，受北京市革委会委托，到清华找沈如槐协调两派大联合，被沈如槐拒绝的故事。言下之意是“414”铁心武斗，沈如槐拒绝调解。韩爱晶为什么就不去想一想毛泽东那只翻云覆雨的黑手？江青肆无忌惮的挑唆？孙怒涛为此与韩爱晶核实，与陈育延探讨，网上电话过招二、三十个回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如陈楚三分析，是老韩把1967年9月前两派联合的事情扯到1968年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老韩说谎。能够证实或证伪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沈如槐、韩爱晶、王大宾。老韩说有，但说不准时间、地点、举不出任何佐证；沈如槐断然否认；王大宾在四川都江堰，老蒯去年还去见过他，王大宾至今保持沉默。我相信沈如槐的说法。清华武斗进入热兵器阶段，普通同学钱萍华都会死于狙击手的枪下，仅仅为了安全，坐阵主楼的头头沈如槐那时根本没有单独会见韩爱晶、王大宾而不为人知的可能。本以为在《拷问》中可以看到老孙的判断，老孙，你

让我失望了。为此，我将去年给你的邮件附于后，以指出韩爱晶在说谎。

孙怒涛学长：

《育延有言》这篇文章上网同时，陈育延也发给了我。你同样执着和较真的态度令人钦佩。看到你的来信，我愿意谈谈自己的认识。

你为“百日武斗”中王大宾、韩爱晶到清华调停一事追寻真相，蒯大富、蒋南峰、陈楚三在泸沟桥小聚会上都有猜测和分析。聚会结束第二天，沈如槐在郭林酒家请吃饭，那天老沈阴沉着脸面对你的询问再次否认了这件事。然后是你、陈育延、韩爱晶、陈楚三的邮件往来。事件的中心人物三位：王大宾、韩爱晶、沈如槐。还缺少见面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局外人争论下去，大家仍然一头雾水。任何断语和结论都有待证实。

为了还原事情真相，我们作以下分析猜想：在皇权专制条件下，战争是政权唯一的催生婆。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不止一次要挟恫吓说，要“重上井冈山”，要去“找解放军”。清华武斗初起，毛江夫妇只是静观其变，“百日武斗”中也未有他们的表态，其他中央首长也视若不见。蒯大富泄愤打倒刘少奇、羞辱王光美，既受到了张春桥、戚本禹的教唆，也迎合了毛江夫妇的阴暗心理。把清华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蒋南翔的老套路，也是蒯大富的新目标。只是一个跟着北方局，一个贴上了中央文革江阿姨。毛泽东的心愿是集神力、皇权、教主于一身，而老蒯是最好的信徒、打手、痞子。于是蒯大富未经任何程序便当上了首都“三司”司令、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毛泽东还说过蒯大富可以当清华大学校长。1968年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仍然难以掩饰对清华“414”的厌恶和对老蒯的昵爱。1970年，蒯大富已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仍被指定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可见老蒯深沐皇恩、宠幸难衰。

清华两派之争，要害是清华大权落于谁人之手。蒯大富错在于是清华土生土长的学生，同学老师知根知底，运动中他的充分表现，失

去了多数师生的支持。“414”是一个“反蒯”的大联盟，反对“痞子上台掌权”才是“414”的宗旨。武斗刚开始，蒯大富的恋人——清华附中刘刚就离他而去，到了陕北：“这个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政治生命完了！”

武斗进入僵局，蒯大富的投机心态促成了他行为上的首鼠两端，团派内部分化成鹰、鸽两派，如同“414”的“东方红”、“三七”两战团。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公安部，既要维护北京和全国的大局，又要偏袒蒯大富，派出一个有蒯大富参与的调解小组，促成一个以蒯大富为主的清华大学权力机构也是必然的选择。当时毛江夫妇并未表态，也许正在等待“414”落荒而逃，蒯大富的团派“打江山、坐江山”的结果，所以这些调解因缺乏威权而变得无足轻重。韩爱晶等人到清华调解不论是一次或是两次，都是真实可信的。沈如槐断然否认在清华武斗正酣时见过调解代表韩爱晶、王大宾也是真实可信的。至于沈如槐是否说过“拖也要拖死蒯大富”的狠话也不重要了。对蒯大富“这个双手沾满同学鲜血的刽子手”，“拖死老蒯”也算不上什么狠话。因为调解不是毛江夫妇的意思，双方师生的血债，让义愤如焚代替了理智思考。蝇头小利上作“蜗角之争”怎比得上英明领袖在祖国山河大地这张“白纸”上横涂竖抹的“伟大战略部署”呢？这“两小撮”“疯子”、“傻子”在打着工人旗号的“皇军”的扫荡下终于同归于尽了。难道四十三年后，我们还要再疯一次、再傻一回？忽然想起辛词中有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可谓一叹！

陈育延信的重点在讲述团派中的“鹰鸽之争”，在述说老蒯一度的大权旁落和内心的彷徨挣扎，在陈述一些多数老团、甚至团派总部委员也不知情的重大事件。坦陈史料是需要明智和勇气的，有如李自茂。时至今日蒯大富已被判刑服刑释放出狱，已用不着为他推诿罪责，他的认识局限出于封建愚忠，至死难改。所有的文革肇事者也已度过了法定的20年追诉期。那些在劫难逃的倒霉蛋，也许有幸成为在建的“封神榜”上人。那些依仗父母权势投机革命、寻求“终南捷径”谋

取飞黄腾达，进而祸国殃民的人才是真正的蠢贼，愿他们继续追随贺鹏飞进入地狱，因从不知忏悔而成为万劫不复的孤魂野鬼。而那个最大的肇事者，那个“始作俑者”却从未被揭发，从未被清算，我们将如何面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何面对还活在世上的十数亿中国人？

清华从来不是两派之争，第三派只是销声匿迹，从来没有散伙。三派中都藏有种种大奸大恶之人，即便回顾历史也不能被派性迷住了眼睛。

你我都没有参加武斗，都没有在场证实证伪的资格。就你而言，建议这场笔墨官司就此而止。

中国传统文人尚重“全始终之德”，你作为“沈孙汲之流”的二把手，居然武斗不在场，让我至今疑惑。我也曾听到过你因没参加武斗而生出的感叹，这种知识分子的软弱，出自贫寒的家世？出自旧文化的浸淫？出自内心的恐惧？十年文革的阴霾，难掩我们心头的阳光。我们已不再青春，不再天真，也不再纯粹，但心中还有一丝阳光，也许就是希望。

唐伟

2011.8.27 于深圳

1968年7月27日，数万工人和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制止武斗。“414”如同见到救星，赶紧欢迎；“团派”如同见到外星人入侵地球，用子弹、手榴弹还击，造成5死731伤的惨剧。蒯大富仓惶出逃，和陈育延到西长安街电报大楼给党中央、谢富治拍求救电报，差点误了夜半后的“伟大领袖接见五大领袖”。老蒯也不想想，这和上一年抓联动的手段与首长接见联动分子的情景有什么两样？那时的打手是谁？背后的黑手是谁？《拷问》中独具慧眼的孙怒涛看见了，“这次召见，414没份儿，连工人也没份儿。”“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

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

毛泽东的历史观来自于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用不着自我批评的。毛泽东的治国之术就是“外儒内法”的帝王术。“7.27”以后，毛泽东给“工宣队”送芒果，又是发指示，又是搞接见，尽管天象森严、天心难测，却也春风雨露、泽被万方。各行各业，各路精英，既受贿赂、利用，又被收拾、打压，无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老干部死去活来，终于明白了为官之道；中学的“小屁孩”被他捧得狂妄了，“上山下乡”也活该；大学的知识分子不可一世了，让他们尝尝当“臭老九”的滋味；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就是不知道“下岗”以后生活怎么办；贫下中农“上、管、改”，“三农”问题堆成山……。林肯说：“一个人可以永远地蒙蔽少数人，也可以一时蒙蔽所有的人，但绝不可能永远地蒙蔽所有的人。”

“英雄真戏子，戏子假英雄。”7月28日的召见，是红卫兵领袖吃的最后一顿“板凳饭”，明摆着的卸磨杀驴、猫哭耗子，孙怒涛却看成了护犊心切、恨铁不成钢。糊涂地认为，“毛泽东没错，是造反派咎由自取，怨不得毛泽东抛弃的。象西安的李世英、北航的韩爱晶，在大联合方面都做得比蒯大富要好得多，也跟着倒了霉。蒯大富在“7.27”中的愚蠢举动，如一粒臭屎害了造反派一锅汤”。

《拷问》中的这些分析，逻辑混乱、因果倒置，聪明睿智如老孙这样的清华“优质生”，认识上如此错位，囿于一己的得失之心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真正揭露毛泽东，谁也讲不清文化大革命。

五、关于两派的理论

所谓理论，不是假设，就是总结。文化革命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历时十年，耗尽巨大国力和牺牲的实践证明，这个反人性、反人类的假设错了。文革发动至今四十多年来，我们天天企盼政治改革带来的思想理论建树，以完成“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哲人先贤所憧憬的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辛亥革命、1949年建国，都没有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开启通往文明富强的康庄大道。宣布文化革命结束后，执政党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平庸怠惰、得过且过，谁不讨厌这种“开左灯、向右转”的虚伪生活？段子里总结说：“中国

是一个毛、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一阵，赵样不行；江就一下，再胡搞一阵；习以为常就行了。”反省文革、“整理国故”，是中国知识分子踏踏实实建设新中国的责任。

文革中，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封了“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就是领袖了。周泉纓写了《414 思潮必胜》，毛泽东调侃他是“414 的理论家”。于是有人讲：“老团有领袖没理论，414 有理论没领袖”。周泉纓此生添了心结，一度在名片上都印上清华大学学生、理论家的头衔，中了魔一样笔耕不已、潜心写作，十二年间，出了七、八本著作。两年前，韩爱晶在收集资料时，轻轻一挑唆，《414 思潮必胜》的著作权出了疑问。罗征启含糊其词，然后沉默不语。万润南尖酸刻薄，说周泉纓“一个字都没写”，还被老毛一口痰堵塞心窍。周泉纓被点中死穴，对老师大暴粗口，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本焕大师摩顶赐名的佛门弟子。李兆汉若未病逝，会站出来说什么呢？

《414 思潮必胜》是周泉纓起草、定稿，罗征启、万润南、印甫盛、李兆汉等人修改而成的。1967年8月3日，周泉纓以“414 东方红战团一战士”署名贴出大字报《414 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由于很少有人关注，周泉纓又化名写了一句口号：看！《必胜》这张反动文章的矛头对准了谁？贴出去后，仍然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去看。到了9月17日周泉纓、杨忌非贴出了一篇内容是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地派”头头的会上点名批评周泉纓说，有人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头上，“周泉纓是个小丑”。随后两个月中，周泉纓受到批斗和关押。周泉纓后来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不反陈伯达，怎么能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造反派头头？”至于毛泽东说，414 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写了一篇《414 思潮必胜》，说造反派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打江山的人为什么不能坐江山呢？周泉纓因毛泽东、江青点名批评而暴得大名，《必胜》这才终于引起了两派批判者的重视。

《必胜》从来不是“414”的共同认识，更不是“414”的纲领和理论，毛泽东说打江山、坐江山的那段话，据说也是张春桥看出来的文章深意。《必胜》还是一封情书，1967年周泉纓去河南郑州调研时，认识了“河造总”的一位漂亮女孩子，在那个泛政治的狂热年代，许多人忽略了这张大字报的副标题。今天的人会奇怪：原来情书也可以这样来写。

在毛泽东淫威日盛的文化革命中，一派群众组织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自外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汲鹏说：两派坚持的理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414在继续革命中更加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老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更加强调继续革命。清华文革证明了这个理论的荒谬。高等学校的派斗发展到武斗，说明“破就是立”的破坏哲学走到了尽头。口水战、笔墨官司只会更加搞乱思想，根本不解决派性斗争中的任何问题。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必胜》成了清华文革舆论争斗中的收官之笔，反映了两派师生为人驱使、为人作嫁、为人替罪的无奈心情：革命已成强弩之末，专政必须加强。不被毛泽东看好的“414”，依附上了统治思想的制高点，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和宦海沉浮中却占尽优势。看看两派骨干精英从那时到今天生命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鸿庆说：清华文化革命是一场大戏，首尾最重要，中间只是过程而已。“清队”、“清理三种人”、“揪516分子”的同时“血统论”不断抬头，今天已发展进入到了“拚爹”时代：“爹是儿的通行证，儿是爹的墓志铭”。两派都不用，两派都成弃子。因为重用自己的子女，至少不会被挖了祖坟。清华文革谁是胜者？谁笑到了最后？“八九”！

“红色贵族”万岁！

第二部分：清华的教育

清华文革大戏收场，劫后余生的清华并没有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资中筠先生说，它已经不是我上学时的清华了，现在的清华聚天下英才而毁之。

1985年清华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从现在起的十年，是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发展阶段”。1993年初的暑期干部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都赞成把学校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到建校100周年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1998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正式提出：“为了实行现代化，我国需要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并且确定北大、清华为国家第一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大学。这个目标既是学校的愿望，更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去年4月是风光无限的清华百年校庆，是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却再也无颜提起。“学校愿望、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成了让人怎么也笑不起来的笑柄。

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曾是我在兰州大学时的学生，他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是“向金钱献媚，向权力下跪。”是啊，不知哪个下流无耻的马屁精把涛哥的照片放得最大、放在二校门图案中最显眼的正中央，把母校众多的先贤、恩师的照片作为陪衬、台柱。尴尬呀！你让涛哥情何以堪！你让母校情何以堪！你让我们情何以堪！

最近，出了一个说脱口秀的北美崔哥，他说北大建校以来出了600个名人，而清华只出了一个蒯大富。这不禁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三个分别来自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吹牛。人大的说：“我们学校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党领导的老师都在我们学校。”清华的讲：“我们培养出了最多的省部级高官”。北大的最谦逊：“我们学校只出了一个图书管理员，但他领导了中国28年。”北美崔哥说得不对，清华名人中至少还有一个涛哥。他和老蒯都来自江苏农村，都是蒋南翔时期清华学生中的“红人”，太多相似的学生生活和共同的清华文革经历，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在优胜劣汰的管理制度下，本应出现难分轩轻的毕业生。奇迹出现了：一样的种籽，种在一样的土地上，同时生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一个是造反有理、“痞子”掌权；一个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这让我们不能不佩服教育的神奇功能，去找寻其中的道理，去重温如同魔咒般的校训。

一、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个标题是我抄黄延复的，一个字都没改动。黄老先生毕业后就在校史办公室工作，我读他编写的书籍资料如聆面训，清华往事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把枯燥的工作干成了兴趣盎然的专业，直到退休。他在故纸堆中找寻人生、心系母校且不忘育作他人，任何一个清华学生心中都会有一丝感动。

1914年冬，梁启超正在清华“赁屋著书”，学校就趁机请他给学生作一次“伦理演说”。梁先生欣然接受邀请，并自定演讲题目为《君子》。他分别引《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描述君子人所应具备的精神和品格。他勉励清华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

1917年周诒春任清华学校校长期间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作图制徽，

定为校训。1949年以后，镶嵌于大礼堂额顶的“清华学校校徽”图案被一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覆盖。老校训从此被人淡忘。上世纪末，覆盖校训的红五星被揭掉，大礼堂上的老校训方才重现。1999年，1958级校友集资将一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字碑镶嵌在老图书馆大厅北壁上。2000年，学校新建东南大门，又把这八字校训铭刻在大门口的巨石卧碑上，以志永远。

二、蒋南翔的“校训”：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蒋南翔时期清华没有校训，只有“南翔精神”。“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八个字可以概括“南翔精神”。但它不如“听话出活双肩挑”，“听话出活，驯服工具”明白生动，深入人心。“听话出活，驯服工具”才是当之无愧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已被覆盖，清华园内再也无人提起。

蒋南翔是1932级清华校友。这位青年团中央副书记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前不久，清华大学遭到了建校以来最蛮横的肢解，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航空系、采矿系……均被切离清华，一个综合性大学变为剩下8个系、22个专业、15个专修科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对于这个对教育事业破坏极大的“院系调整”，现在极少被人提及，更不用说反思教训。父母死了，子孙不忘拜祭。母校惨遭肢解，却从不再提起，只想从心里忘记！“欲灭其国，必亡其史”。我们就是这样的无耻、无颜的人子、学子！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时，学生最多的系是政治系。现在津津乐道的国学大师，就活跃在清华学校最后的两三年中。清华理学院的创办人叶企孙和他开创的充满理性光辉的整个时代，离开了他生命中永远的清华园。这个对中国科学贡献巨伟的大师，生前无人看望，死得无声无息。仅仅是因为他无儿无女？仅仅是因为文化革命？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真实的历史，而少数知道的人慑于恐惧而接受“党性”的约束。文理大学可以不设工科，文理学生不须精通工艺、了解生产流程，实验数据可以通过交流获得。工、农、医等应用学科的学生，须臾不能缺少数理逻辑、理性思维、历史启迪、人文关怀。学校被肢解后的清华学子要获取诺贝尔奖的梦幻追求，如同残奥会选手妄想获得奥运会冠军。在“院系调整”中，清华这个美国人用中国人的钱办的中国大学还不是最惨的，那个对中国情真意切的司徒雷登，用心血和意志浇灌出来的燕京大学被锉骨扬灰，美丽的燕园成了她美丽的衣冠冢。从此，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在中国大陆

绝迹。清华的断臂残肢，在政府权力魔杖的点化下，奇迹般地长成了矿业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林学院……，斯大林不仅送来了建造大学的图纸，还派来了权威的专家、教授。晚清、北洋、民国时期办学，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富国强兵、为国家培养可用人才是第一位的。“一边倒”向苏联，既受迫于国际冷战大局，也是政治需要，谁人说长道短，必是反苏亲美。蒋南翔有不同意见，那时还人微言轻，并没有置喙的地位；他多年以来耿耿于怀，始终不认同“院系调整”，但从来没有站出来秉公直言，别人劝阻并不是理由，党性原则才是原因。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蒋南翔正率领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他反对校园内搞群众运动肃反，校内主持工作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党中央决定的。党性再一次压倒了理性，蒋南翔不再坚持正确意见。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灾难中，蒋南翔惨遭抛弃，他的学生、辅导员、干将听党中央的话，纷纷与他割袍断义、划清界线。蒋南翔倒台后，清华的“保蒋派”中除了刘冰等极少数人，什么时候有人站出来为蒋南翔说过公道话？文革的哪一个群众组织不拿批斗蒋南翔来标榜自己革命？蒋校长不是一个坏人，每个学生都受过他语重心长的教诲。他对自己几乎贡献一生的教育事业痛心，而清华文革也让他丧失了自己推行的那一套教育理念的自信。1981年，为了争取区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全国高校学潮汹涌，我当时任兰州大学团委书记协助刘冰校长处理学潮。刘冰几乎每晚都要和蒋南翔部长通电话汇报学潮情况，蒋部长每次都要问一句：你那个团委书记表现怎样？我已经持有了蒋校长给清华毕业生授予的“猎枪”，也从蒋校长的关切中感受到了他对清华文革的反思和担忧：他或许想起了1966年8月的那个夜晚，“马楠将军”当他的面将他继母吊在梁上毒打的惨状，亲眼目睹自己播下的“龙种”，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魔鬼、惟命是从的小爬虫和满世界乱窜的“跳蚤”，悔不当初的心情可想而知。一个高校的团委书记如果变成了耗子屎，足可以坏掉学生思想工作这一锅汤。蒋校长对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不无忧虑，这绝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和教育的成功。

梅贻琦还有一句更精采的名言：“没有坏学生，只有教坏的学生。”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何等慈悲、何等浩荡的胸襟胸怀！蒯大富、涛哥、也包括孙怒涛和我，以及我文章中提到的所有同学，都不是坏学生。2005年，在我们入学40周年的

校友聚会上，张孝文校长对1964级、1965级的学生讲：“你们虽然没有在清华造就成才，如同面粉没有被蒸成馒头，但你们进校前就已经是好面粉了”。找寻清华文革罪孽的原因，不能不认真反省清华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训，而是情真意切的校训。

有同学将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发到了清华校友网上，一位同学指责我对“联动”分子的温情。我不是因为“联动”分子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手上染血，心上支楞着罪恶的十字架，我只是不愿让貌似义愤的怒火烧红自己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是什么人、什么事教坏了他们。暂时离开一下蒋南翔，听我讲讲我对清华高干子弟的认识，听一听“狗熊”吴慰庭的故事。

吴慰庭的经历能回答不少问题。孙华栋是武斗中第一个当了俘虏后被活活打死的同学，凶手有多名“清华技工学校的莽撞小青年”，领头的人绰号“狗熊”，原自控系67级学生、团派“前哨”广播站负责人、保卫组的吴慰庭。1968年5月14日“晚上，‘414’无线电系64级同学孙华栋骑自行车从动农馆返回科学馆，路过一教时，被团派同学绑架至一教楼内，遭‘狗熊’及在一教的中技校的一些人毒打，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给喝水后死亡”（摘自《清华文革亲历》）。1968年在清华的批斗会场上，“狗熊”被押送部队农场“劳改”，后被公安机关判刑13年，刑满那年赶上“严打”，他又多坐了两年牢。1985年48岁的“狗熊”和因为“出身不好”又要照顾多病母亲的大龄女李大姐结为夫妻，未育子女。

2007年初冬，来访清华的外宾可以看到一个七旬老者孤独地在寒风中擦洗工字厅的玻璃窗，那老者就是四十年前打死孙华栋的“狗熊”。现住天津的“狗熊”年迈患病，没有社保、医保，也就没有退休养老金。李大姐的退休金刚过千元，两人平均刚超过了天津市的低保线，“狗熊”又不能享受低保。街道上只好每月给个50或100元的补助。自七同学为他们捐了一万元钱，这两口子就是不用，总想退回去。“狗熊”的社保难于解决，除了职能部门的推诿、不作为外，还缺少社会、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同情。自从五年前我认识了“狗熊”，我认为他是一个犯过罪的好人，李大姐更是一个侠骨柔肠的好女人。

“狗熊”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是接管北平市领头的三个军代表之一。“狗熊”的生母是天津一位医生的女儿，救过他受伤的父亲。如故事一样爱上英雄、结婚

生子。如故事一样男人奔赴革命，奔赴延安。如故事那样“狗熊”和生母从天津到南京、西安一路的艰辛寻父。“狗熊”当过大烟馆的小杂役，架电线的小工，母亲为人洗浆缝补，1953年16岁的“狗熊”才得知父亲在北京当了大官。“狗熊”生母最终也没能见到孩子的生父一面，在“组织”干预下离了婚。生母唯一的要求是要生父将“狗熊”带到北京接受良好的教育。经过育才小学短期培训，“狗熊”和陈楚三、毛远新同一年上了101中学。父亲在延安娶的“革命妈妈”厚待“狗熊”，“狗熊”每月有30元生活费，有自行车、手表、照相机。后来“狗熊”的父亲又姘上了一位国民党营长的姨太太，该营长刑满出狱后，状告共产党高级干部霸人妻女，“狗熊”父亲受到组织处分，从6级高干降为9级。“革命妈妈”在父亲再娶这位姨太太之前患尿毒症而死。“狗熊”说，她是被父亲有外遇而气死的。武斗伊始，父亲就从天津到清华一教，劝“狗熊”回家，说中央规定高干子女不得参加武斗。“狗熊”讲：陈楚三的继父也是武汉空军的高干，他能在科学馆参加武斗，我为什么不能坚守一教？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里，父亲传达中央规定也被儿子置之不理。许多高干子弟早在一年多前就离开学校，凭关系进了部队。他们有“组织”出面提点、关照，共和国都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为什么他们的子女要去经历没有好处的危险呢？“狗熊”的革命精神和正义感还表现在另一件事情上，他知道了蒯大富占了便宜又要抛弃女友刘刚，而刘刚是他继母带来的妹妹同在清华附中高一年级班里的同学，“狗熊”几次守候在强斋门口，准备伺机将蒯大富暴打一顿。

孙华栋死那一年，“狗熊”31岁。

后来，清华校办同意出一笔钱，为“狗熊”补交社保费，曾任天津市领导的65届的一位校友也出面帮助，希望他能象老蒯在深圳那样得到妥善的解决。就在这几天，孙耘发来邮件告诉我，“狗熊”的社保解决了。今天（2012年7月7日）下午我接到了“狗熊”从天津来的电话，那无法压抑的喜悦让人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酷暑严寒，为了获得作为公民权利的区区社保，他奔波、等待了6年！吴慰庭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75年中，他前16年随母寻父，中间15年在蹲大牢，最近6年跑社保，老天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生放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也很高兴，为社会有温暖而高兴。母校代他补交了26万社保基金，除了解决就医困难，每月还能领到2900多元养老金。相信听过他的故事的清华同学都会为这对患难

夫妻的晚年生活有靠而感到宽慰。

吴慰庭的一生令人同情，他少年时随生母寻父的经历更催人落泪，他狂热、冲动、冷酷和暴戾的性格绝对不会事出无因。父母是人生第一个启蒙老师。有的高干父母如同戏台上威风八面的英雄，下班回家后也从不舍得“卸妆”，传唤儿女训话有如贾政召见宝玉，如果家中是赵姨娘当政，亲情上的冷就足以摧毁一颗幼小的心灵。不少高干子弟也许生在硝烟战乱的小路边，长在马背摇篮的艰苦岁月中，未必得到了发育阶段应得的关爱和教诲，引领他们走上人生道路的人，也许只是家中的保姆。他们在新社会光荣门楣的优裕生活中，有人德才缺失、恩义淡泊也在情理之中。“英雄不讲出身”。高干家庭一样人才辈出。陈育延曾告诉我，她家在中南海住过一段，与陈伯达家比邻而居。陈伯达的女儿喜爱文史，可陈伯达坚持毛主席讲的“学了文科也没用”，只准许女儿报考理工科大学。陈伯达的女儿最后拒绝报考大学，去部队当了兵。父母，尤其是大人物的父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儿女身上，是多么不近情理的事情。在清华，上到蒋校长、下至政治辅导员，对高干子女最欠缺的就是一颗平常心。

权力可能腐蚀当权者，也就不可能放过他们的子女。

追究清华文革种种表现的原因，不能不深刻反省清华的教育。反省文革前的清华教育，蒋南翔同样是绕不开的话题。用韦君宜的话讲，蒋南翔到清华当校长是把“一肚子教育理想都带了去的。”蒋南翔的办学理念既有个性，更有党性。

“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39岁的蒋南翔迈进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清华园。”他是带着党化教育的任务到清华当校长来的，从到学校的第一天，在他的讲话中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日益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中的阵地，这是我们学校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1980年，死里逃生、重掌大权的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重复和重申了这段话。蒋南翔在清华校长的岗位上工作了13年。1988年5月3日，蒋南翔因胃癌去世，临终前还对清华大学当时的负责干部说：我认为“又红又专”比“德才兼备”这一提法更确切。

60年代的清华学生早已无从知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耳熟能详的是“南翔精神”。“南翔精神”伴随蒋南翔来到清华。1953年初，清华成立政治辅导处，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南翔精神”开始生根；“南翔精神”大成于1958年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提出的“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南翔精神”完善于1961年形成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这个《高校六十条》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系统地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经验，用主要精力草拟，并多方面征求意见而形成的。196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高校六十条》，并得到毛泽东的核准。毛泽东说：“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半个世纪以来，蒋南翔之后的清华历任领导萧规曹随，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上殊无建树，“南翔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蒋南翔后来担任了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其实清华大学在“南翔精神”指引下早就办成了党校。有人总结说，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就是纠正毛泽东错误思想的理论。其实说这句话的人高看了邓小平，邓小平只是在毛泽东的专政思想框架内，添加了经济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兴奋剂。对于毛泽东、对于文化革命这两件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大事，他极不负责任的敷衍塞责，“宜粗不宜细”的回答等于在历史的拷问下交了白卷。清华何尝不是愧对历史，看看清华的校史展览和反右、文革，许多重大事件被恶意删除，一些良知缺失而又权势在握的人物早已丧失了坦然面对历史的勇气，这样的组织行为只能是更加可耻可悲！

“南翔精神”并不主要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而是毛泽东思想在教育战线上的体现，是毛泽东“自己的东西”。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只是渗杂进“南翔精神”中的私货，清华文革中被他的包括政治辅导员在内的学生们，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严加批判。蒋南翔只是“南翔精神”最坚定、最忠实的执行者。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乏善可陈，他虽然就学于师范，也算一个有旧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却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这也许与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的打工的经历、一段“卑微的伤心史”有关。他指责北大“庙小妖风大，池深王八多”。这是一种恨惧交加的复杂感情。他对清华并无偏见，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修好之前，毕竟有清华体育馆的室内游泳池供他享用。他并不是教育家，却特别中意“伟大的导师”的称颂。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提出了“三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又红又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学习解放军”，包括1964年2月13日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蒋南翔等16人参加了座谈，

从传达内容看，也就是些标语、口号：

“教育的方针、路线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

“学制可以缩短。”

“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

“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

“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毛泽东所谈的教育是党化教育和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把宣传和培训也当成了教育。

清华大学不是党校，但却办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以培养“毛主席的好战士”、“三大革命运动战士”为目标，这是蒋南翔的功劳。老蒯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的典型，涛哥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得好”的典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造反有理，痞子掌权”和“又红又专”，既是毛的号召，也是“南翔精神”。早在文革前，清华学生都在争当“听话出活，”的“驯服工具”，这是清华校风中的主流精神。

“党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对教育进行控制，把教育变成宣传党义的工具，是国民党最早在中国推行“党化教育”的。1924年，国民党仿效苏联，首先在广东推行“以党治国”的政策。为了制止学校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停止了“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实行“党化教育”。随着“北伐”的胜利，“党化教育”蔓延到全国，所有学校都开设国民党“党义”课程，教育变成了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

集“党化教育”大成者是蒋南翔。除了开设马列主义政治基础课，评选“先进集体”活动，蒋南翔特别强调：“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蒋南翔创造性地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党化教育”在工作中落到了实处，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这是他推行“党化教育”最突出的贡献。

1953年，蒋南翔让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何东昌起草了一份向高等教育部、人事部请示设立政治辅导员的报告。根据“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

党团员”的标准，从当时在校最高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了25名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的学制延长一年，学科则相应减少，每周进行24小时工作。辅导员队伍归团委领导。经过清华文革十年劫难，1977年政治辅导员制度得以恢复，当时学生中党员已占多数，已不宜由团委管理辅导员队伍，清华第一个成立学生工作部，负责全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还逐步增派了一批博士生担任辅导员。

第一批25名辅导员第一次会议是在新林院蒋南翔校长家中召开的；50年代有突出表现的辅导员被选送苏联留学，学习新学科、新专业，返校后就成了新学科、新专业的创办者和学术带头人。这一传统在后来，改变为优秀辅导员不须考试直接就读研究生，“多数辅导员给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据1993年统计，现任12名校级干部，其中10名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系主任、系党委书记及机关正部、处长中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约占45%。最新的统计是：清华大学1949年后培育出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1人，中共中央委员50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国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9人，省部级领导280人；全国人大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7人；全国政协副主席13人，政协常委116人；最高法院院长1人，最高检察长1人。清华，只有清华，才有这么多的“听话出活”、“双肩挑”的人才。“教授治校”见鬼去吧，清华大学“以吏为师。”

思想“灌输”的效果和成败，不取决于灌输者，而取决于被灌输者是否接受。而接受灌输的前提是受灌输者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不难看出政治辅导员必然要先受其害，更不难理解为什么服从、听话的奴仆思想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式。所以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的清华牌政治家多如星辰，而兼有人格魅力的清华牌政治家却寥如晨星。

政治辅导员学习的马列主义理论，主要有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刘少奇的“两论”，即《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团委在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指导下，贯彻《高校六十条》编写的《团支部工作五十条》。其中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等论述影响至深。

1957年的“反右斗争”，才是政治教育的生动课堂。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一举击碎了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必须“夹起尾巴”

才能“做人”。“反右”第一线总指挥邓小平亲自到清华作报告，毛泽东钦点那个说“什么话”的黄万里教授成为了“右派”。公开的原因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写了《花从小语》，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党必须过河拆桥和民主党派分道扬镳，不整肃多嘴多舌的知识分子，如何统一思想？黄炎培在世的另外两个儿子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没听说有什么“右派”劣迹和言论，也一个不漏地被打成“右派”。毛泽东调侃黄炎培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一门五右派”的黄炎培还敢和毛泽东“窑洞对”，夸夸其谈什么“周期律”吗？蒋南翔和蒯大富一样热衷权力，经常提醒身边的干部“要有政权意识”。钱伟长教授 1942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是解放后首届校务委员会成员，又被派往苏联学习、访问，有新中国学界“三钱”之美誉。钱教授聪敏博学、全知全能、眼生于顶、口若悬河，对蒋校长多有不敬；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婿，袁氏夫妇是和平解放北平、有功于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因为阶级斗争中手软，而成了蒋南翔的掣肘。“有政权意识”又不乏阶级斗争警惕性的蒋校长，岂不要打造一个从这里漏气的发动机？和钱教授、袁书记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师生有 500 多人，和清华文革中被抓出来的“蒯派”人数相差不多。毛泽东因抓出 300 多万“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超越秦始皇等历代暴君，夺得“坑儒”之冠；蒋南翔因清华反右斗争制造恐怖而赢得威权。

在“反右”之后提出的教育方针，红专目标再无人反对，“党化教育”大行其道。又红又专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通俗图解，也是“南翔精神”的核心内容。又红又专来源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 22 条，讲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早在 1955 年 11 月 7 日在发展刘仙洲副校长入党的支部会上，蒋南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就是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1958 年以后，又红又专的指导思想就成了抓教育的一条主线。蒋南翔常对学生讲：“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只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政治往往成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政治是解决方向问题，方向不对头，就达不到目的。”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服从分配。如刘仙洲、张子高、梁思成等著名教授成为了“文物”，除了撑门面当摆设，他们在学生中几乎没有学术上的影响；而如张光斗一类投机

钻营、腆颜造假、曲学阿世之徒却见风得风、见雨得雨，光荣入党，一直爬到副校长的高位。一大批“蒋南翔式的”、“双肩挑”干部，从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从政治辅导员、“助教党”的队伍中成长起来，和找到“归宿”的老知识分子实现了“两种人会师”。一个“永不漏气的发动机”就这样打造成功了。

1958年，在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领导下，团委着手整顿辅导员队伍，重申辅导员制度的要求，全校辅导员从150多人减到80多人。1977年何东昌指示，尽快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至今这个制度已有了近60年的社会实践，培养出了大批优秀辅导员，不仅充实了校系领导班子，而且为党中央领导的梯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涛哥就是最杰出的代表。

当上政治辅导员，在学校里，就意味着成为最优秀的优质生，“革命事业接班人”已经非我莫属。有了这样的耀眼经历，毕业以后都能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辅导员是他们的晋身之阶，所以他们对辅导员制度感激不尽、赞扬有加。有一位辅导员出身已经成为金字塔之顶的高官回清华对学生现身说法：“做辅导员工作可以密切和学生们联系，更重要的是，做辅导员的经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学会与人与社会打交道，对一生的成长都很有用，不吃亏的。”当我问起我所熟悉的一些辅导员时，他们也是类似的感受。他们多因为有助于本人的成长来肯定辅导员制度的。

在我看来，政治辅导员制度所起的作用主要有这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机会对同学进行“兴无灭资”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灌输、监督、控制，清除异己思想，排查异己分子。

教育、灌输是软性的一面。所谓灌输，就是洗脑，洗掉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注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过程，其实与传销的洗脑差不多的。辅导员们自己先被洗脑，然后再洗周边同学的脑。不仅要将与正统说教有异的思想清洗掉，那些有点棱角的个性、正常需求的私心，统统都在纠正、克服、抑制之列。青年学生五彩斑斓的内

心世界，最后被灌输成单一的红色，再没有其他的色彩。

监督、控制则是比较硬的手段，这针对那些教育、灌输效果不够理想的差质生的。

教育、灌输、监督、控制的具体措施五花八门，无孔不入。其中有一种叫“个别谈心”的，是我最反感也最害怕的。

辅导员和颜悦色地找你促膝谈心，表面上看似亲热、平等，目的就是套你的话，从中找出思想倾向上有问题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会放过。辅导员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你是禁闭的。偶尔，他也会说一点他的想法。当心，这是一种“钓鱼谈话法”——以自己无关紧要的小事把你思想上偶尔一闪的隐秘想法钓出来。谈完回去以后往往会记在工作笔记本上。一次次的谈话，加上其他各种场合下观察到的表现，成了你完整的思想档案。到了某一天需要“帮助”你的时候，一条条有日期有时间有地点有场景有旁证的记录会翻腾出来。到那时，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差不多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反动学生了。

辅导员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是不断地锻炼、考察、培养辅导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维护体制的骨干力量。

政治辅导员才是今后掌权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他的人，不过是革命事业的打工仔。这些辅导员，名曰又红又专双肩挑，都是根红苗正，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观点鲜明，对党无限忠诚，在学校期间已经学会掌握了如何控制群众思想、如何制造革命舆论、如何搞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掌权的手腕。

我不否认我认识的不少辅导员本人的品质都是不错的，我也不否认他们为同学做过不少的实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辅导员队伍只是执政党统治学校、推行教育路线、扼杀独立精神、实施思想禁锢的工具。

在文革初期蒋南翔刚刚倒台的时候，一些激进学生的矛头最先指向的是与他们接触最多矛盾很大的政治辅导员。我看到有的大字报上把辅导员每月18元的生活补贴费叫“养狗费”。这种污蔑人格的说法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不赞同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那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对辅导员制度已是很反感的。现在看来，如果把执政党比

喻成一家“大院”的话，那么，这支辅导员队伍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看家护院”。

以上引文来自孙怒涛《拷问》中没用上的材料，这是一个清华高年级师兄的真实体会。

学生政治辅导员大多来自“红五类”的农民、工人家庭。尤其那些坚信“王子永远是王子，贫儿永远是贫儿”，既顺从又听话的同学，最适合辅导员工作，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他们纯朴勤奋、感恩心切，对“奴化教育”、“痞化教育”殊无反感。植根底层民众的奴隶思想、皇权意识很快上升为对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阶级感情。因为只有那种奴性入骨、惟命是从的人，才是最适合被打造成暴力机器的胚子。

1965年，蒋南翔在毕业生大会上讲：“毛主席1957年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作了分析，我们可以把思想过硬概括为三个境界或比喻成‘上三层楼’来要求：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后来的系统提法是：

第一个台阶，是做爱国的文明的守纪律的学生。

第二个台阶，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国家分配，自觉自愿为人民服务。

第三个台阶，对学生中一部分先进分子，要帮助他们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¹

“党化教育”本质上是虚伪的，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奴化教育、痞化教育。黄万里是1953年评定的二级教授，出于对官僚体制的抗议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拒绝写申请当博士生导师。还说：“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黄万里成了清华唯一拒

¹ 以上部分内容主要抄自2005年版的《蒋南翔传》和方惠坚的《清华工作50年》。

绝写申请，而没有当上博导的教授。蒋南翔曾说，“红”就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服从分配。曾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就是一个不服从分配的反面典型。黄菊是清华电机系电机专业63届学生、班团支部书记，毕业前夕表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听说要分他去大西北，他害怕艰苦，放弃分配，蹓回上海，在上海人造板机械厂参加了工作。他的行为为老师、同学不齿，电机系可能都没给他发毕业证书，他也从来不敢回学校。贺鹏飞勉强考上清华，1970年分配到甘肃武都地区工作，去那里看了一眼，就被那里的艰苦环境吓回来了。贺鹏飞回京途经天水，巧遇和我一个年级、分到武都工作的段姓同学，一番交谈下来，段同学也不服从分配了，他们一起逃回了北京。贺鹏飞已在若干年前死去，死时任海军副司令、中将军衔。

不能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只是虚伪地喊“精忠报党”的口号，能不给清华丢人？无数事实证明，如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废除任何带奴役的契约，就无法指望培育出美德。

清华学生在清华文革中的表现发人深省，孙怒涛还在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任主力军是青年学生，既有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竟成了只听命于领袖的枪手，充当了无辜的炮灰呢？

党的教育方针是在反右以后的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已经上了高中，对这一方针出笼前后所受教育的变化有切身的体会。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初几年，要恢复国民经济，要镇压反革命，要抗美援朝，要土地改革，要搞合作化，要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等等。及至政权比较稳固以后，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斗争，标志是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对教育实行全面控制，标志是提出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

回想起来，对我的德育影响最大终生受益的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党的教育方针。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个“五爱”教

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个时候没有提“爱共产党”，也没有提后来替代“爱护公共财物”的“爱社会主义”。

到了高中，开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因为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当大跃进成为全党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以后，即便是一所县中，也要垒起小土炉炼铁。

因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于是，垦荒种地、夏收夏种成了一门分量最重、占时最多的课程。

政治与教育，是有关联的。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是相对独立的。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把教育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这完全是错误的定位。

更为错误和荒谬的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必须为某一党派的政治利益服务，成为某一党派狭隘私利的工具。

至于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的方针，也是极端化的。

无论是叫又红又专，还是叫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有用人才，或者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意思都差不多的。在清华，这一培养目标有一个通俗形象、简洁明了的叫法：听话出活。

所谓听话，当然是忠心耿耿地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党把你放在哪里就在那里死心塌地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就是“红”，就是“德”，是政治标准。

听党的话，落实到具体，不仅要听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党中央的话、领袖的话，还要听从基层党组织的话，听从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的话，甚至是听从一个普通党员的话。总之，就是听领导的话，听上头的話。脑袋是用来吸收、消化党的指示的，不是用来独立思考的。谁要是有点自己的思想，有点个性，那就意味着与党离心离德，与党不是一条心，那就被视为开始走上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道路了。

所谓出活，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以精湛的技术做好本职工

作，做一个能为党高效率服务的工具。这是业务标准。

在听话与出活上，听话永远的第一位最重要的。

要培养听话的人，首先必须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也就是“兴无灭资”：灌输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思想等正统思想，其他的思想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封资修的，都必须彻底清除干净。

于是，从高中到大学，被灌输进脑子的是这些东西：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是永远英明的、不会犯错误也没有丝毫缺点的，抗战八年打日本鬼子是全靠八路军新四军的……

红专大辩论、参观反右展览、联系实际的“九评”学习、学习“毛选”、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雷锋、参加“四清”、政治课教育、党课、还有各种各样形式繁多的活动、会议、参观、座谈等等，都是我们上过的阶级斗争主课，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听话的人。

我并不一概否定这些活动，也不是说这些活动的效果一无是处。作为原本纯洁的学生，我们是从正面去接受这些教育的。譬如“学雷锋”，我们从中学做好事，付出爱心，这是对的。但在这些活动中，各级组织的着力点是增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也是在强力灌输阶级斗争观念和奴隶意识。

不同时期的青年学生，都有共同的特点，如有爱国心，有民族自尊心，有政治热情，追求进步、真理、正义，向往光明美好的社会，单纯，幼稚，勇敢，易被鼓动，易受蒙骗，等等。文革前的青年学生，经过十多年的党化教育与奴化教育，更增加一些新的特征：对领袖无限忠诚，对毛泽东思想深信不疑，阶级斗争这根弦蹦得特紧，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无比痛恨，敢为共产主义理想赴汤蹈火，等等。这样的一群青年学生，个个都愿意成为红卫兵、党卫军。文革之所以能得以发动，原因之一是学校已经为文革准备好了成百万的冲锋队员、枪手和炮灰。

孙怒涛的思考痛心疾首。“党化教育”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发生了极大的混乱，

以小骂大帮忙见长的党内大笔杆子邓拓，竟被自己献身的组织构陷委屈上吊而死；明史专家吴晗校友“曲学阿世”，视学术精神如玩物，把一个朱元璋写得颠来倒去，为迎合圣意宣传“海瑞精神”，反被诬为“反党分子”彭德怀一党，夫妻双双受尽羞辱迫害致死；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了出来，清华骤发雪崩，从党委到基层支部的负责人，乃至个别政治辅导员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党性发生“变性”，再无其他纲常伦理来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精神大厦。清华大学被损毁的不仅仅是“二校门”，蒋南翔鼓吹的“三层楼”也轰然坍塌了。

三、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殉文化”而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鲁迅说：这位“老实得象火腿一般”的国学大师，在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两年后，“便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了。现在清华一教西北小山坡前的王国维纪念碑上，镌刻着陈寅恪窥破天机的不朽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纯为知识、学术，勤奋读书、游学，是“中国最博学的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他以洞悉幽冥的历史眼光，看到了“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代表的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彻底破产，“戊戌变法”是中国人第一次企图从政治制度上文化自救而以失败告终的行动。慈禧没得选择的选择了“晚清新政”，刚刚起步的“立宪运动”被“辛亥革命”一枪毙命。宫帷深

锁的帝后奢糜生活让站起来了、富起来了的中国人梦萦魂牵、艳羡难已。爱国压倒启蒙，爱国主义成了蒋校长政治思想教育的第一个台阶。民主、科学只是时髦的口号，“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了最有广告效应的“烂尾楼”，值得我们年年凭吊。最迟钝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赤县神州遭逢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国社会的上一次“奇变”，始于“商鞅变法”，大成于西汉“独尊儒术”。那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演进。“天人合一”的封建文明支撑起了一个泱泱大国三千年的农耕社会。元、清、俄、日……的异族入侵和蚕食，一次次地阻断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和平崛起。任何一个文明古国失去了今天，也就没有了过去，不管过去何等强大、如何辉煌。一次次的救亡和内斗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久历劫难还不是最可怕的，“劫尽变穷”让中国人无路可走才是最可怕的！陈寅恪如同窃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以大勇气、大智慧、大情怀、大心愿昭示读书治学的知识分子要铭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一“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训导，要象张骞一样去“凿空”，去劈开中国变革图强、建设崭新文明的大道。

陈寅恪的校训比梁启超的校训晚十余年，同样没有被贯彻在清华的办学宗旨和教育理念之中。由于对今天教育乱象的反思，有的人高估了民国“黄金十年”教育发展的成绩，轻浮地说什么“中国高等教育30年里走过了西方办大学1000年的路程”。不知道丑陋的中国文人什么时候能改掉总是夜郎自大、蛙鼓蝉鸣的坏毛病。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毕业生总数只有10万人，只是今天一年大学毕业生的六十几分之一。仅此一点可知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多少骄人的成绩，《围城》中的假文凭和野鸡大学生，生活中照样有。问题是我们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有问题，不信任知识分子，不尊重他们的劳动。用杜牧的章句形容：“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按照黄延复老先生关于大师的标准：“大师者，至少应具备以下五种品格：高尚的人格、博通的学术、深邃的思想、卓绝的识见，儒雅的文采”。我斗胆以为除了陈寅恪、黄万里、叶企孙等寥寥数人，还有几个清华教授配称为大师？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都是在国外高校完成学业、做出成绩的。不能把栽培他们的功劳全都归于中国教育事业。当然也不应抹煞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战乱频仍、非常艰苦的环境中的卓越工作。在清华，梅贻琦校长就是楷模。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潘光旦合作撰写的《大学一解》中。他主

张大学之道：明德修己、新民、止于至善。大学的直接目的：发展学术、作育人才。他要求学生具有“超阶级”、“超党派”的“宏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不应该给学生以某种政治派别的思想，只应该给学生判断的能力，让学生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他要求学生与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宽广的综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全人格”的人，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他还主张“才不通而身不得出”，即没有通识准备的人，不允许其参加社会事业，社会事业才可能良性发展。为了感受一代教育大家的流韵风采，我不去说他那些枯燥乏味的“通才论”、“大师大楼论”、“坏学生论”，下面有三个故事感人至深。

梅贻琦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2.9”学生运动后，军警将到清华抓捕宣传抗日的进步学生。梅贻琦校长将军警的抓捕名单张贴在布告栏中予以公告，在教师、工友的掩护下，蒋南翔等被通缉的学生全部安然逃脱。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梅贻琦民主治校，在于对校长一职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他曾说，校长就是在戏剧中饰演皇帝角色的人，他端坐戏台中央高高在上，但他不是剧中主角，除了一两句自我介绍的道白，甚至连一段象样的唱腔都没有。我曾设想有一天，重临西南联大旧址，在校园草坪席地而坐，手捧台湾作家鹿桥的《未央歌》，追怀那个国难岁月的大师风采。抗战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资历、人望都在“寡言君子”梅贻琦之上，但他们都信服地支持梅贻琦主政校务、共度时艰。梅贻琦一生从未遭逢异词谤语。我私心暗忖：蒋南翔校长也能做得到吗？

真学者视学术为生命。梁思成回国的目的很纯粹：共产党来了也会有人盖房子。说到梁思成自然难忘风华绝代的林徽因，林才女患肺病喜静，据传梅校长曾命人在新林院梁宅前竖一警示牌：“林徽因住此，请勿喧哗。”梅校长做事如此风雅，实不让六朝故事，令人追忆神往。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没有被人从校训中“腰斩”掉，因为它从来没有成为清华校训。民国政府致力推行的同样是“党化教育”，蒋总统梦寐以求的也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任何反民主、反人权的独裁政权，注定与

现代文明绝缘。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已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了3000年了，果真“天不变，道亦不变”？身为“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帝师”、被传统文化彻底“化”了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投湖而死去“殉”哪门子能够永世长存的文化？我曾偏激地说过，只讲天道、地道而不讲人道的知识分子是伪君子。且不说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八级台阶”的人生追求中有多少权谋欺诈，只是向“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牌位磕头的拜师礼，就能说明这是培育奴才的第一课。启发兴趣，提倡思辨，鼓励怀疑精神，推崇超越前辈先贤，让学生认识自己、做好自己，才是教育的真谛。有如亚里士多德超越老师柏拉图。孔门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哪个学生超越了孔子？两千多年下来，汲鹏说是“老鼠下崽，一窝不如一窝。”现在清华检讨自己：“自强不息有余，厚德载物不足。”纯属脸皮太厚的文过饰非。

徐葆耕学长和我有数面之缘。他俨然已是清华“国学专家”，我有点难以置信。他为了称颂今日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风貌，提出了一个荒谬的“灾难铸就辉煌”理论。这个理论有点奇怪，它不追寻灾难的原因，总结灾难的教训，也不去寻找规避灾难的办法，只是出人意外地歌颂灾后的辉煌。

这个理论颇受主流青睐，并广为流行，地震、矿难、高铁出轨后，这个论调都能在主流媒体上“辉煌”好一阵子。徐葆耕有两个例证：一是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是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二是清华“文革动乱后，在‘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¹

“灾难铸就辉煌”，通俗说法是：“灾难就是辉煌”，这是毛泽东的“破就是立”的破坏哲学的另一种表述。常识告诉我们，创造和建设才能铸就辉煌。当年西南联大师生生活异常艰苦，闻一多教授要业余篆刻图章换米求生，如果生活无忧，他们的学术成就是否会更为斐然？乱离人可怜！文史学生尚可苟且延读学业，科研、实验应当难以为继。那时的清华学人之所以还能有所成就，只能说明专制的学术钳制比战乱还要不出学术成果、还要让人才思枯竭。葆耕学长是否也要像毛

¹ 徐葆耕：《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载刘琅、桂苓编著《大学的精神》页19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泽东对田中角荣谈话那样，像无耻地感谢日本人的侵略那样去感激灾难呢？

至于说到文革后清华的堕落，罄竹难书四个字有点过分，痛心疾首是国人的真实感受。葆耕学长也看到了，“对于一个班、一个班的（清华学生）留学美国”，清华已被讥讽为“真正的留美预备学校”。事实上现在的清华留学生和前辈大不一样了，老清华留学生大都回国报效国家，今日留学生大多定居国外，如若回来也多半是加入了“八国联军”（坊间称世界百强企业为“八国联军”，称民营企业为“义和团”）杀到中国，回国为了赚钱。人各有志，其中原因总有不同，自然不必一切为外人道。我要强调的是：清华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上做得不好，不好到已经留不住人才了；国内工作、生活条件让精英们有了出去不回的理由。清华学生比较许多其他院校的大学生，也许是更听话、更出活的“驯服工具”，但不争的事实是：清华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更大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令人满意。还记得张孝文校长的“面粉”比喻吗？考进清华的都是优质生，如同精白面粉，我也不相信清华能把好面粉做成了棒子面窝窝头。

在给孙怒涛的信中，我曾错误的认为自由、独立是资本主义口号，是1980年代香港高楼上悬挂的商业广告：美国精神。前两天去珠海，张鸿庆再次点化我：陈寅恪的校训是他纵观古今、学贯中西，开悟得出的时代精义。新芽萌生于老树的残躯、种籽，任何新思想、新事物都切不断与陈旧、腐朽、死亡的联系。在生命将死将生之际，有能量的消散和凝聚。宇宙的历史是一部能量不断改变存在形式的变化史。吸收物质，积聚能量，构建文化，锤炼思想，微小的人类就拥有了生生不熄的力量。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如果对陈寅恪那一代知识精英采取舍弃和健忘的态度，就是对中国历史的无情，也是今天中国人的不幸！

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了，“用全人类所有的先进文化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头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达成“一切人的解放”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和全国人民一道都应具有“公民意识”？大学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是容不得盗袭兵焚的斯文神圣之地。它虽然诞生于西方教会的怀抱，但神圣的大学也禁止在校园里、课堂上宣传教义、党义。大师是人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站在知识的最前沿，站在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天堂和地狱的分界上，揭示真理、预警灾难、昭示未来。他们因自己的学术成果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他们不应该因学术思想有悖于统治思想和社

会生活的“主旋律”而被整治得死去活来、挨批受“坑”。

1968年7月27日后的清华文革还有整整8年的干烧高压锅里的“热寂”岁月。本应普照天下的“红太阳”盯上了“六厂二校”，红太阳聚焦，“熵增原理”在清华出现了反常。通过8341部队的宣传科长迟群、机要秘书谢静宜，毛泽东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控制了清华。清华文革如朕亲临，继续革命的战略战术、阶级斗争的政策策略全凭圣心独运。先是制造恐怖、获取威权，具体做法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抓516分子”、办江西鲤鱼洲“牛棚”；然后是招兵买马、组织队伍、训练打手，一是从64级、65级的学生中，挑出700多名根正苗红、听话出活的学生留校充实教师队伍，视为“新工人”；二是招收各级革命委员会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红卫兵、工农兵，“两兵”大学生占领上层建筑，名为领导“斗、批、改”，实为充当打手、炮灰。最后由“梁效”写作班子吹响战斗号角，从清华、北大向全国掀起“反右倾回潮”、“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一波紧接着一波的巨劫连绵，无休无止地冲击着赤县神州。这不仅是“党化教育”，更是党的“全面专政”。毛泽东劫尽将亡，他也曾惊惧于陨星天象，伤感于枯树文章。哪一个知识分子不被他折腾得思想麻木、精神癫狂。若干年后，巨恶元凶阴魂不散，涛哥出来宣布：“不折腾了”。大家觉得反正“劫尽变穷”，跟着涛哥得过且过罢了。于是清华百年校庆齐颂盛世、大唱赞歌：“精忠报党”！

迟群是个痞气十足的烂仔，小谢只是后宫嫔妃、答应中比较能认字的人，他们来自掌权痞子的身边，有如来自奈河桥那边的牛头马面。其实权力有自我扩张的天然秉性，和个人的道德品质无关。让全校师生员工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是原始的丛林法则，却非常有效，这就是秀才遇到根本不和你讲理的兵的心理劣势。

那八年中，清华成了兵痞横行之地，被逼死的人、被批斗的人、被冤屈诬陷的人、被体罚被侮辱的人比哪个时期都多。毛泽东认为清华文革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结合“清队”、“抓516”、“整党”甄别干部，重建各级组织。批斗、恐吓、引诱、揭发是一贯手法，利用捕风捉影、知情人急于洗刷自己去立功举报，只要还有自尊自重，不会佯狂自污、唾面自干、宁弯不折的人，多半不会平安过关。工化系副系主任李文才文革时作为交流学者在英国学

习，武斗结束前才回到清华，工宣队认为他和清华运动、清华派系没有关系，打算第二天把他“三结合”进入系领导班子。但考虑到他在北京x中学读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就找他谈话，要求他第二天写出交待材料。当天晚上，李文才因惊恐而自杀身亡。在批斗工化系党总支书记滕藤的会上，党总支副书记黄志冲被罚站在滕藤身边陪斗。由于黄志冲是清华教工子弟，说话多、欠严谨，又分管学生工作，接触人更多，留下的把柄也多，可供揭批的言行比滕藤还多，教工的发言多冲着黄志冲去了。据滕藤后来对我说，黄志冲一定认为他是工宣队在工化系的主攻目标。批斗会后黄志冲越想越怕，上吊死了。

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是一个废弃了的劳改犯农场，占地9300亩。首批398名教职工于1969年5月到达，先后有3000多位教职工及家属在这个血吸虫病区斗私批修、改造思想。1970年查出血吸虫病患者747人，疑是血吸虫病患者111人。我的三哥、工化系教师唐晋也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1971年10月全部人员撤出鲤鱼洲，迁至北京大兴团河农场。奥斯维辛集中营杀人用毒气，迟群、小谢用生物武器，不仅环保，也利于隐匿真凶。你若拷问血吸虫，它绝对不会招供主谋就是那个1950年代诗中讲血吸虫已被“照天烧”了的毛泽东。

迟群、小谢用“冷暴力”构筑的专政机器，在教育、培训（包括军训、下工厂农村劳动）、宣传之间划出了两个等号，即：教育=培训=宣传。他们名为关心青年学生，实则利用、出卖青年学生。清华的教改经验是中南海痞子总店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直销过来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里的样板，简称“六厂二校经验”。

毛泽东亲自抓的清华教改，是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讲，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需要的只是奴隶中的工匠。谁都可以看出清华“斗批改”的教育革命有多荒唐。但它远离教育宗旨，偷换教育内涵，以教之名义，行害之实质却并没有被注意，更没有被清算。在教育产业化的荒唐指挥下延续至今，怪不得资中筠痛叱清华聚毁人才。熊庆来说：“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倡导的就是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知识分子做事做人的两大原则，也就是熊庆来讲的“学术生命和精神”。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改革无定式，无法预设

蓝图；改革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改革并不痛快，大多相当痛苦；改革就是做学问，须钻研更须积累，“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投机取巧，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只能像“大跃进”那样害死许多人。

提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就是承认学术文化不仅是事业，而且是超越国家、政党、阶级利益之上的事业。陈寅恪说：“国亡然能有史，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诫，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

“国家危难，史学衰落，此已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死继绝的大节”。只有这种气吞山河，包容万物的“雅量”，才能保持华夏民族文化火种长燃不熄。

“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是育人育己的方向和目标。也就是马克思主张的“人的解放”，从自在走向自为。梅贻琦说：教育本身必须以每个人为对象，从每个人的自身着手，其目的就是首先要促使他们的完整人格的养成。

陈寅恪于1953年12月1日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到：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当然，毛公、刘公岂能“应从”陈寅恪的“狂悖”之言，没有治他的罪也只是因为他名气太大，1953年的文网也还没有收到后来那么紧。但陈寅恪坚守大节的心志、胆色却令人动容。

黄万里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敢于担当的清华教授。我的长兄杨美卿曾是黄先生的学生，后来又同在水利系泥沙教研室工作。黄先生“怀璧沉沙”的坎坷人生和难得的人品、才情、学问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对三门峡工程的论断的正确，已被时间和实践证实。我在读黄万里时注意到以下几件事：

密云水库建成几十年来一直是北京的主要水源，也是清华教育革命拿得出手的主要成果之一。黄先生计算了水库上游河段历年的流量，曾向钱正英部长建议降低大坝的高度，在“经济困难时期”节省投资自有利国利民的特殊意义，但是他的建议无人理睬。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落难教授，如果没有学理精通的大胆识、没有对专业的执着、没有对国家强盛的一往情深，他怎么还要去面对钱部长等人丑陋的冷脸，而自讨没趣呢？

反对修建三峡大坝工程，是黄先生临终都耿耿于怀的不解心结。他早年考察过几乎所有的川江水系，如同预言黄河的泥沙作祟，他预告长江的砾石将堆积三峡水库的库尾，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形成极大的祸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我，乃至我的长兄杨美卿教授都没有能力判定黄先生的意见是否正确。但是论证三峡工程不让有资格和能力的黄先生参加，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能叫重大决策前的科学论证吗？黄先生还提出缓冲意见：用建三峡大坝不到一半的钱，在川江上游建10个水电站，发电能力即可与三峡电站相当。黄先生于1992年写《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1995年写《吁请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决不可修！》，从1992年1月到1994年，黄先生连续致信江泽民总书记、中纪委、监察部，有的信甚至用了举报的方式。对于一个知名教授几近疯狂的抗争，有关部门和有关大员一直装聋作哑，显是体制没有人性的冷漠。2001年8月27日黄先生溘然长逝。弥留之际他挂记的还是长江、三峡。临死还问女儿：“黄委会你知道吗？”

对于关系重大的“南水北调”工程，黄先生也有宝贵的建言，惜乎同样没人理睬。“黄钟毁弃，瓦釜长鸣”，这个典故用来说谁呢？

专家总是片面的，不片面不能成其为专家。黄万里先生不是那种专家级的匠人，他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家学渊源、文词高雅；数学、力学功底扎实。1930年代初的黄河、长江水灾，促成了他改行水利，一生求学只是为救国救民。他以学习为最高最大的善行，不断更新自己的已有知识。

他发现熵值和焓的单向变化将控制水流、泥沙的运动，他不断用新知识、新理论增进对江河水系的认识。“热力学第二定律”、“混沌理论”都是他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是毕生都在潜心学习，学问不断精进的大师。

黄先生一生坎坷，活得艰难，生于忧患，死也遗憾。实践证明，黄先生没有错，是拥有权力的政府和上级组织错了；黄先生并非不幸，他有值得为之奋斗的学术和真理，不幸的是国家和人民！先生仙去，我们怎么能不痛惜大师！

我相信教育可以兴国。由于深圳大学罗征启校长（当时张维任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召唤，我放弃了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刘冰校长给我安排的省委办公厅的副职，于1984年1月来到深圳大学创业，希望能跟随清华师长在特事特办的深圳特区，办成一所争创一流的高等学院。罗征启在深圳大学改革最精彩的一项是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我在深大任党委办公室负责人。党办有4名工作人员，后来增加了1名发余热的老干部——人民大学前任组织部长徐景秋做顾问。党办是全校唯一的党的专职组织机构，囊括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工、青、妇的所有工作；党委书记和各系的支部书记（当时系上还没成立总支）一律兼职。三、四年下来，学校各项工作照样生机勃勃，党员教师投身于教书育人的一线工作，没有任何特权，也没有什么党群矛盾，一点也没有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由于实行学分制，逐步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政治时事课、公民素质课和学生勤工俭学供学生选修。事实证明“去党化教育”也是可行的。

深圳大学的教育改革还是失败了。1989年的“6.4”，导致罗征启下台并被开除党籍。其实，深圳大学教育改革在这一事件的两年前就败象显露、祸根深种。深圳大学一直未能进行民主办学的制度化建设，没有建立对校、系主要领导的权力约束机制。民主只是形式，集权才是目的。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派来的副校长和清华派来的罗校长矛盾重重，教师队伍缺少为改革出力的新血，包括清华在内的教师纷纷调离，蝇营狗苟之徒遂集权力中心，深大改革焉有不败之理。何东昌部长曾说过一句极不负责任的难听话：“罗征启，他懂教育？”我以为去掉这句话的恶意后，还是值得深思的。

“6.4”是罗征启下台的直接的导火线。总结清华文革教训，应该知道学生参加群体事件绝非好事，不管社会哪种势力竭力鼓噪，为学生前途着想，校长、

教师抵死也要把学生阻拦在校园之内，绝不让他们跟着“蒯大富们”去搞什么“12.25”行动。我们过去的革命传统教育中充满误导，我就十分着迷过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她站在行进的有轨电车上抛撒传单的镜头，简直就是油画中的自由女神在引领大众奔向光明自由。看看真实的历史吧：学生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表面浪潮，深层涌动的是纷繁复杂的直系、皖系军阀之争，亲日派、亲英美派的政客之争。“五·四运动”后，北大校长蔡元培引咎辞职，内疚自己未能保护好学生。

罗征启校长作为一名党员，他犯的是组织错误，不是政治错误。周泉缨说：“罗征启得罪了中国两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在清华他得罪了陈云，在深大他得罪了邓小平”。每当念及罗征启对清华学生、深大学生的关爱之情；每当想起早上上班的路上，见到他和梁鸿文老师走走停停、指指点点，精心设计深大的规划布局，安排在哪里添修一条路，在哪里多种一片草。我的心中对他和梁老师就有一种浓浓的敬意。在深大工作时，我多次冒犯过他，说“罗校长在深大的改革事业将随他下台而一风吹掉，而他盖的房子将会成为他永远的纪念碑”。对他在深大禁止抽烟，我说过：“林则徐虎门禁烟，被发配伊犁；罗征启粤海门禁烟，将来不知会被发配到哪里？”唉！至今想来我都后悔死了，这张讨厌的乌鸦嘴！

上大学，独立思考能力最重要。真正在人类社会起作用的制度，都不是精心设计而是有机演化、逐步尝试出来的。从教育着手应当是中国改革的切入点。民主政治不仅仅是一套政府制度，民主还应该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高等学校应该是教育养成这种良好生活习惯、并有益于终生的圣地。

在自由匮乏的社会里，只有思考的碎片，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思想。香港回归前，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但是无论如何，思想总是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如何面对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总理的挑衅性预言呢？

这篇“读后”或许会让所有读它的人面临一场精神折磨。语云：“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我把它送给孙怒涛学长和我那些传奇般的清华同学，我感谢他们在恩怨情仇的真实世界里一生与我同行。

2012/7/15

【博士论文】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二）

向前

导论

二 问题的提出

人们常常用“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来描述文本诠释的多样性。文革研究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众说纷纭。

1、众说纷纭的文革原因

最核心的问题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文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文革的起因方面又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说。一是从领导人层面，一是从国家和社会层面。

因为文革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所以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学者们的看法各有侧重，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权力斗争说、政策分歧说、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混合说。这个层面探讨的代表性著作就是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该书详细地回顾了文革前高层领导关于现代化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分歧，在文革前历史中找寻文革爆发的原因。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的研究不限于对领导层的分析。金春明把国史学者的研究概括为三种。他总结道，第一种看法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对此，金春明评论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表现，它是在中国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并不是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都必须进行的，它也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进行革命的主要内容，更不是不搞这种所谓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巩固，就要蜕化变质。从宏观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并

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¹

第二种意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没有历史根源的偶发事件，它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个人的过失造成的。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金春明认为这些看法从认识论上说均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其共同的缺欠是过分地突出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²

第三类观点也就是金春明自己所持的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表现，但也不是一个领导者的个人过失造成的。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党对国内政治状况及主要矛盾做出了错误判断，制定了错误方针路线而产生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是严重的“左”倾错误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产物。它是当时中国社会蕴聚的各种矛盾，包括党内矛盾、国内矛盾和国外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毫无疑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过失绝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认真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特别是1956年以后的历史发展，可以找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种种客观历史因素。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其发生的前十年国内外蕴聚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³

金春明认为文革“是当时中国社会蕴聚的各种矛盾，包括党内矛盾、国内矛盾和国外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但他的著作中没有对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论述。他提出的“三个恶性循环”——“左”倾理论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同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⁴实际上仍是讨论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可以看到，国内文革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位于领导层或领袖的研究，通史的宏观叙事框架中很少看到社会大众的身影。

持“社会冲突论”的学者们是较早并且一直关注社会矛盾的（详见前一节）。李鸿永、陈佩华、王绍光、裴宜理等都在这个方面有专门研究，大陆学者徐友渔、李逊、唐少杰等也深受影响。这些学者视角向下，从社会内部矛盾看到了群众组织分裂的原因，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参与文革的普通群众身上。

本文认为，上述说法均有各自理由，他们谈论的是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那

¹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2.]

²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3.]

³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4.]

⁴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138.]

么，视角向上和视角向下两种研究如何统一起来，高层领导（或者说毛泽东）的因素如何与普通群众联系起来呢？本文分解出文革原因的结构层次，以便清楚地说明相关问题。

2、文革原因的结构层次

文革的原因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第二是普通群众为什么会参与文革；第三是参与文革的群众为什么会分化，群众组织为什么会产生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第一个层次的研究非常多。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金春明的“三个恶性循环”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本文目的不在于讨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只是将这一因素作为“外力”，考虑其引起的后果而不探索其原因。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第二个层次是普通群众为什么会参与文革。这里有一种可能性——即使毛发动这场运动，但普通群众有可能不参与其中。但是，正如后来所见，实际情况是亿万人民群众参与其中了。不少著作将群众的参与解释为对领袖的盲目崇拜、非理性的大众癫狂，或者是某些野心家的蒙蔽和煽动。也有学者对其他方面提出各种看法。唐少杰提出，学生红卫兵充当文革先锋与“红卫兵情结”具有直接关系，红卫兵的孕育和形成于新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¹徐友渔考察了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对青年学生成长和性格养成的影响，提出红卫兵投身文革的普遍性因素是青春期激情，革命至上、反文化和反文明倾向、斗争哲学、阶级路线等多个因素塑造了学生红卫兵。²李月军认为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合法性，它在一定时期内对文革起到了强烈的支撑与推延作用。³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政权建立后，国家对社会全面重塑——党国体制之下，国家全面统摄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空间，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国家掌控了全部资源，在国家分配系统之外不存在任何的资源获取渠

¹ [唐少杰. 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J]. 社会科学论坛, 1999(11): 85-88; 1999(12): 85-91.]

² [徐友渔. “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A]. 见: 徐友渔. 直面历史[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139-211]

³ [李月军, 侯尤玲. 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 38-42.]

道，形成了社会成员对国家全面的依赖关系。在国家严密的控制下，政治运动的动员极为容易，民众参与政治运动“异常踊跃”。¹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够全面彻底地贯彻自己的政策，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跃进运动。

进一步追问——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普通群众参与了文革，但他们为什么产生了明显的分化，群众组织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最终还在武斗的战场上厮杀？《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当时的两大派都是“极左”思潮下的组织。这个提法并不意味着，不同群众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就可以忽略。²如此，就进入第三个层次——群众为什么分化和冲突？长期以来，国内学者过分强调参与者的同质性——由于群众心理的存在，运动的参与者会失去自我，形成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使运动的参加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而忽略了运动参与者的差别。既然群众是高度同质性的，为什么他们会分裂成不同派别并且爆发激烈的冲突？

持“社会冲突论”的学者大多比较关注文革参与者的群体差别。裴宜理和李逊以上海为个案，分析了三类工人的行为差异，从党组织网络、心理文化倾向以及团体特征三个途径解释差异产生的原因。徐友渔将群体差别的原因归结为文革前即已存在的社会性矛盾和政治性矛盾。李鸿永、陈佩华等认为造反派之所以造反，是因为他们大多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他们在文革前属于政治上不得志、受歧视的人；在文革中，与积极维护现行体制的保守派相反，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这些差别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家庭出身”。³

具体观察文革的各个群众组织之后，可以发现，“家庭出身”这一变量对于解释群众组织普通成员的行为基本适用，但对于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群体往往缺乏解释力。因为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中很少人“家庭出身”不好，不少人还是党、团员。他们是因为文革初期名列另册受到打压，后顺应形势变化才组建或加入造反派组织投身造反的。所以，解释群众分裂与冲突的原因，需要在“家庭出身”之外抽离出新的变量，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把“家庭出身”和当时中国

¹ [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88.]

² [秦晖. 沉重的浪漫——我的红卫兵时代[A]. 见：徐友渔. 1966：我们那一辈的回忆[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296.]

³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China Quarterly, Iss. 83 (September 1980), pp. 397-446.]

社会内部存在的其他矛盾都转换成变量整合进来。文革前即已存在的社会性矛盾和政治性矛盾除了“家庭出身”之外，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用“政治身份体系”概念描述国家和社会个体之间的连接机制——党国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按照政治身份分配资源的层次分明的政治身份体系。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资源分配不平等带来的矛盾，致使社会结构的张力日益增大，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和紧张关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社会大众的分化也渐成客观事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大众分裂的公开化，最终形成了群众的对立和冲突。

三、本文的思路和资料来源

1 本文的定位

首先，本文论述的时段限定在1966——1969年，选取这一段是为求与本文主题切合。

这三年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时期，国内一般称为文革的第一阶段，不少海外学者认为这三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本文不涉及文革是三年还是十年的争论，故对此问题不予展开。]这三年是群众参与规模无与伦比和社会问题表现得最为深切和鲜明的阶段，而后七年则基本恢复到一切在党领导下进行的模式。¹正是因为群众获得了短暂的自主建立组织和一定的自主活动空间，他们的诉求和行为取向才充分地表现出来。

其次，本文是地区文革史个案研究。

在通史类著作中，由于篇幅的限制和行文的总体要求，难免对诸多事件的细节和前因后果缺少交待和详细阐述。因而，通史类著作的优点在于对全面整体的情况都有涉及，但部分细节问题往往存有空白。通史类著作的宏观叙述框架下，领袖是历史舞台的主角，抽象的“群众”仅仅在需要的时候作为陪衬；北京、上海几个重点城市的片段被当作普遍现象，似乎全国各地的运动都是情况相同，步调一致；选择性记事为历史的日志留下了诸多断裂和空白。长此以往，势必形成简单化、概念化、抽象化的认知模式。

各地的情况复杂多样，要对总体有全面的认识，各地区文革史研究是最基础

¹ [卜伟华.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M]. 香港: 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08: 793-794.]

的工作。本文定位于个案研究，选取湖南长沙 1966——1969 年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考察对象，一方面顾及全国运动形势对长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涉及省会长沙对省内其他地区的影响。将该地区的文革史理清之后，试图从区域的视角透视整体，再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部分，以把握宏观和微观、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再次，本文是视角向下——通群众的研究。

宏大叙述关注长时段的历史走向、历史演进的通则，却往往忽视了普通人的行为和活动，将本来复杂的历史本身风干。从普通群众的角度入手考察地方文革历史，可以使研究更加多元化。文革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是重视高层忽略底层，重视精英忽略大众。诚然，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它又远远超出了宫廷斗争的范围——人们提到文革，首先想到的是一场把亿万人卷入其中的政治运动。¹如果没有群众的参与，没有群众的分化和群众组织的对立，文革不会把中国社会搅得天翻地覆。与 1949 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相比，文革不同于其他任何一次运动。其他运动中，从未出现过群众的分化和对立，呈现出一面倒的响应号召。为什么文革会显现出特殊性？这些原因需要在社会内部、群众内部去寻找。

最后，本文力求从结构性视角解释群众在文革中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动机并非旦夕之间形成，而是根植于文革前的日常生活。个体面临的挣扎和抉择，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探寻人们行为的动机，将个体置于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其行为背后的逻辑。

2 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

王绍光指出了文革研究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领袖取向和群众取向。他认为，文革没有按照任何人的意愿一帆风顺地发展，虽然是毛发动了文革，但是高层人士、老百姓和中层当权者，处于各自的动机都参与了文革。如果不着眼于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文革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²

佟新和沈旭将王绍光所说的两个取向拓展为“国家与社会”视角，关注国家权力及这种权力与其影响下的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更扩大至关注国家领导人、权

¹ [徐友渔. 形形色色的造反[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9: 5.]

² [王绍光. 理性与疯狂: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 9.]

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由此，他们把文革研究划分成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二是对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¹

本文借鉴上述观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文革中的群众加以考察。所谓宏观层面考察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比如国家的制度和政策、领导人所作的决策等；微观层面就是普通个体在这一既存环境下呈现怎样的状态，他们对所处的环境具有怎样的认识；中观层面则是联系宏观和微观的纽带，即宏观层面的因素如何经过转化最后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去，从而对个体产生影响。以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举例来说：

宏观层面——第一，社会存在阶级的划分，将个体按照“家庭出身”等标准归入不同群体；第二，文革之前国家即已推行上山下乡政策，在60年代规模扩大，并且要求各级政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执行；第三，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要求贯彻“阶级路线”。

中观层面——上山下乡政策的执行需要选择出一批人来上山下乡，以什么标准选择哪些人呢？在贯彻“阶级路线”的背景下，招生录取制度产生变化，发挥筛选的功能，致使大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落榜无法升学。各级政府动员这些落榜学生上山下乡。宏观层面的因素经过中观层面的转换，不是作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体，而是对其中的部分群体产生了影响。

微观层面——部分城镇学生因为“出身不好”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成为国家政策最终的影响对象。从此，他们失去了城市户口成为农民，失去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只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生活的困顿和前途的渺茫使得他们希望摆脱现状有所改变。最后，毛泽东发动文革（宏观层面的因素）提供了的机会，他们参加造反，要求回城落户和安排工作。

考虑到文革参与者来源于不同群体，本文区分出学生、工人、知识青年三个主要群体，将其纳入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分析框架分别论述，揭示他们投身运动的原因。

本文的核心概念主要有“政治身份体系”，这一概念只在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使用。“身份”是指社会赋予个人、与职业及其他社会角色相联系、标

¹ [佟新，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J]．开放时代，2007(2)：43-44．]

明人的社会地位的类别标志。¹国家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标志，分类标示的过程就是确定社会成员身份的过程。在传统中国社会，身份是由人伦血统、宗法等级、占有分配以及道德义务的差分来确定的，不同身份的个人被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在社会中形成“支配-服从”的关系。本文所说的“政治身份体系”与党国体系相联系，特指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以“阶级分析”为理论基础确立的复合身份系统，包括阶级身份、城乡居民身份、干部-工人身份、所有制身份四个面相。根据社会成员在政治身份体系中的位置，国家为每个人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支配-服从”的关系。

文革中的群众都在文革前的社会结构中被标志出不同的政治身份，他们处于不同的层次或等级。依据各自的政治身份，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在政治运动成为常态的环境里，他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政治正确”以防止自己的政治身份向下变动；同时，不少人表现积极，希望获得组织的青睐以进入向上流动的行列。参与文革的群众之所以出现分化和对立，之所以在运动中做出这样的行为而不是那样的行为，与他们各自在政治身份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变动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文对参与文革的群众进行群体区分，分别考察他们在政治身份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变动情况以及对其行为的影响。

政治身份体系是政权更迭、历史变迁的结果。新政权带来的党国体制使得国家和社会高度融合，社会结构产生颠覆性更新，确立了按照政治身份分配资源的政治身份体系。文革中，群众的行为与其在政治身份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其行为背后的根源在于政治身份体系的结构张力。如果说参与文革有可能基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那么群众的分裂和冲突则清楚的表明了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和深层次的社会冲突。

3 资料来源

本文使用的文献史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第一，档案和地方志。

文革时期的档案绝大多数未予开放。由于本文探讨的问题多数可以追溯到文革以前，所以本文使用了湖南省档案馆馆藏的文革前档案材料（下文简称“湘

¹ [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6]

档”)，主要有湖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全宗号 144）1 号目录下的第 748、1043、1050、1051 卷，省教育厅（全宗号 173）中 2 号目录下的第 79、82、84、90、100、110 卷，3 号目录下的第 332、429、558 卷；省总工会（全宗号 153）1 号目录下的第 1252、1255 卷。

地方志主要使用了《湖南省志》系列，包括第 1 卷《大事记》、第 3 卷《党派群团志·工会》、第 4 卷《政务志》、第 5 卷《军事志》、第 17 卷《教育志》和单卷本《共产党志》。县市地方志有《长沙市志》、《长沙县志》、《湘潭市志》、《株洲市志》、《邵阳文史丛书》、《道县志》等。此外，还有《长沙文史》第 17、18 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以及《湖南大学校史》等。

第二，报刊和史料汇编类出版物。

“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发动和指挥文革的重要工具，因此“两报一刊”的文章尤其是重要社论对文革的进程往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和 1966—1969 年（除停刊阶段）的《湖南日报》均是本文重要资料来源。本文也参考了国防大学政工党史教研室整理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六卷以及红卫兵小报和非正式出版物，如 1968 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其他群众组织印发的《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一万多篇文献收录进去（基本包含了上述报刊的所有文章），总字数接近三千万，查询方便快捷，为本文写作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第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相关人士正式出版的回忆录。

本文参考了大量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综述中提到的著作大多在大陆出版，部分在香港、美国、台湾出版。文章来自各种学术期刊，部分英文文献来源于 JSTOR 数据库。对本文具有参考价值的回忆录也在文章有所采用。前文已有综述，此处不再重复。

第四，口述材料和未刊稿。

由于对长沙文革史研究的著作不多，本文运用口述材料来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采访地点主要是长沙，还有郴州、衡阳、邵阳等地，采访对象包括文革时期的工人、学生、知青、市民等。另外，本文对民间自印书籍和未刊稿经过筛选鉴

别后有所使用，主要有应山红主编的《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陆芒的《老虎坪纪事》和张介山的《非常岁月》。民间自编刊物有《记忆》、《往事》、《往事微痕》等。其他还参考了陈益南、杨大庆、张扬等人的未刊文章。

四 本文的结构与方法

导论和结语之外，正文分为三个部分。

导论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介绍本文的基本问题、研究思路和相关概念，将本文定位于视角向下的地区文革史个案研究，研究对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前三章构成本文的第一部分，描述1966——1969年长沙文革的过程，对历史场景作全景式的再现。第一章叙述1966年5月文革爆发到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的过程，交代了“8·19事件”、“9·24报告”等影响日后形势发展的重要事件。第二章描述1967年1月“夺权”开始到《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下发之前，造反派的分裂和争斗。第三章讲述1967年8月以后省革筹、革委会建立的过程以及秩序的重建和巩固。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分析文革参与者的行为和动机。第四章界定了群众组织的名称，根据确定的标准和方法，将长沙的群众组织归类，分析各组织的人员构成、行为取向和诉求。第五章在前文基础上，就各个群体在文革中的表现，在文革前的历史中找寻原因，着重论述了学生、知青和工人三个群体，分析群众分裂的原因和行为动机。

第三部分即第六章，从个人行为与外部社会的相关性出发，分析群众分裂和冲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将之归结为政治身份体系结构的张力。政治身份体系的建立基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变迁，国家对社会进行了彻底的重塑，形成个人对国家的全面依附关系。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彻底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在政治身份体系中，人们各自所处的位置即是日后行为倾向的出发点。

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简要概括，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防止文革式的政治运动卷土重来提出浅见。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¹本文希望到社会内部去探求现象的根源，使用的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利益分析方法，分析

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37.]

不同政治身份的人们，不同社会群体乃至个人的利益分歧和诉求，揭示其行为背后深层次动因和社会根源。其次，任何政治现象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本文也使用历史分析法，把研究对象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和背景中去加以考察，寻找政治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原因。在此过程中，比较研究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比较群众的不同群体（学生、工人、知青等）、各群体的不同派别（保守派、造反派）。此外，在分析某些具体问题时，本文也借鉴政治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等研究方法。

【书讯】

《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在港出版

向胡杨

此书由朱永嘉口述、朱绍君整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12年2月出版。（120元港币）。全书25章，分别介绍了毛泽东晚年所读的古文的注释和印刷情况，讲述了这些古文的内容、作者、写作背景；分析了毛泽东选择这些古文的用意。书前有口述者撰写的前言和“《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篇名总目时间表”，书后有朱绍君撰写的“编后记”、朱永嘉的小传，及朱永嘉写的《关于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一文。

朱永嘉是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中共党员，历史学者。文革前即参加了华东局内刊的写作组，是“罗思鼎”中的主要成员。文革中他先保皇后造反，先后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四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主席团成员、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等职。1971年下半年至1975年10月期间，他接受姚文元的指派的任务，组织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专家学者和上海写作组历史组的成员为毛泽东标点、注释、校对了一批大字本的古文诗赋。

“四人帮”被打倒后，朱永嘉于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80年被开除出党。1982年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陷罪”等罪名判处14年徒刑，1990年刑满释放。

此书的整理者朱绍君在文革期间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在图书馆工作。2008年春节后，他为了给中国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硬着头皮去揭开朱永嘉先生的‘疤痕’，请他吐出真相。”二人经过半年多的默契配合，于2008年9月春节完成了这部书。

【问与答】

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探讨学问免不了会遇到难题，如有专家在侧，不啻福音。本刊特邀请了造诣精深的学者解答大家的问题。若来稿提问，请简略介绍一下个人情况，俾便参考。

陈闯创致《记忆》编辑部：

我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2008年6月于毕业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我一直在致力于文革政治史的研究，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特希望贵刊能请卜伟华、余汝信等文革史专家为我释疑解惑。我的问题如下：

关于未出席中共十一届十一中全会的 39 人名单 和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 59 人名单的问题

多位历史学家均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简称八届十一中全会）和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简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到会人员构成有明显异常这一事实¹，其中八届十一中全会有 141 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即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下分别简称为“中委”和“候补中委”）出席和另外 47 人列席，八届十二中全会有 59 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出席和另外 74 人列席²。笔者尚未看到有公开著作详细列出这两次会议的与会者名单，为方便分析，本文将分别考察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未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员名单和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至于列席者名单容待考。

截至 1966 年 8 月 1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时，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在世者共计 180 人，其中 91 名中委、89 名候补中委³。据称有 68 名中委、73

¹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²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页 20-21。]

³ [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时期”》页 25-31。1958年5月中共

名候补中委与会，也就是说有 23 名中委、16 名候补中委共计 39 人因为各种原因未参加会议¹。查各种资料，笔者目前能确定未到会的 20 名中委和 11 名候补中委共计 31 人的名单，余下暂不能确定的 8 人（3 名中委、5 名候补中委）可缩小至 12 人的小名单。名单见下文。

20 位未出席的中委：陈云、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陆定一、罗瑞卿、彭真、杨尚昆、李立三、林铁、王稼祥、杨献珍、谭政²、陈绍禹[即王明，当时他在苏联]、曾山³、滕代远⁴、欧阳钦⁵、刘格平⁶。

余下 3 位未出席者或许出自以下 6 人：郑位三、叶季壮、刘长胜、李维汉、萧克、王从吾。

11 位未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刘仁、周扬、蒋南翔、周小舟、万毅、奎璧⁷、陈丕显⁸、黄火青⁹、徐子荣¹⁰、周桓¹¹、李昌¹²。

八届五中全会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此时中委共 97 人，候补中委 96 人。此后到 1966 年 8 月前共有 6 名中委去世，他们是林伯渠、罗荣桓、陈赓、柯庆施、李克农、刘亚楼，另有 7 名候补中委去世，他们是甘泗淇、周保中、张德生、邵式平、张玺、蔡树藩、彭涛。]

¹据称到会者有中委 74 人、候补中委 67 人[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 20 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页 358。]，但由于有 6 名候补中委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 8 月 12 日递补为中央委员[他们是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所以此前与会的中委应为 68 人、候补中委为 73 人。[另外据说有 26 名中委、候补中委被决定不让参加会议，见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自杀之谜》，《文汇报读书周报》2011 年 5 月 13 日第 12 版。]

²[自陈云至谭政 15 人名单可见于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页 186-187。但卜称乌兰夫、邓华未到会，应不确。乌兰夫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见《乌兰夫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页 533）。据张纪、李玉芝《邓华生平大事年表（1910 年-1980 年）》，邓华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和十二中全会，见罗印文：《邓华将军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版，页 381。]

³[查人民日报 1966 年 8 月 8 日、15 日、28 日报道，曾山于 8 月 7 日下午乘火车离开北京，13 日乘机抵达刚果（布），26 日乘机返回北京。据此可知曾山未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后半段，但不知曾是否参加会议的前半段。查《曾山生平大事年表》1966 年 8 月条，仅记述其出访的内容而无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记录，见苏多寿，刘勉玉编《曾山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¹³[滕时因病在鞍山疗养。《滕代远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年版，页 391。]

⁵[据黄火青回忆，欧阳钦与其同在养病，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 208。据欧阳钦妻子黄葳回忆，1966 年 3 月欧阳钦在北京开会时重病送到 301 医院抢救，见《回忆欧阳钦》，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版，页 444。]

⁶[见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下）》，《华夏文摘》增刊第五一七期（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五—），2006 年 8 月 6 日出版。]

⁷[自刘仁至奎璧 6 人名单，可见于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页 186。]

⁸[陈时在上海养病，见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页 72。]

⁹[黄当时在丹东养病，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 208。]

¹⁰[受罗瑞卿事件牵连，徐子荣在 1966 年 6 月 10 日起召开的中共公安部党组扩大会上接受

余下5位或许出自以下6人：刘震、章汉夫、古大存、张启龙、洪学智、钱俊瑞。

笔者尚不能确定截至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时中委在世者为87或88人¹，但与会者只有40人，其中39人已可确定；候补中委在世者78人²，仅19人与会，其中17人亦可确定。

39位出席的中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陈伯达、蔡畅、李富春、徐向前、邓颖超、刘伯承、陈毅、李先念、聂荣臻、滕代远、肖劲光、粟裕、王首道、邓子恢、叶剑英、张云逸、康生、陈郁、邓华、李雪峰、陈少敏、王震、曾山、徐海东、胡耀邦、刘格平、谢富治、王树声、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谢觉哉、王恩茂。

剩余1位出席者或出自以下4人：徐特立、王维舟、胡乔木、程子华。

17位出席的候补中委：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刘子厚、吴德、李大章³、唐亮、陈奇涵、天宝、赛福鼎⁴、范文澜、宋时轮⁵、李志民⁶。

剩下2名或许出自以下6人：李涛、黄欧东、张宗逊、陶鲁笏、洪学智、黄火青。

最后，我有几个问题请教：

一、笔者确定的未出席十一中全会和出席十二中全会名单中是否有误？

批判。见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页206。另外，在该书页233所附《徐子荣生平大事年表》1966年条目里没有徐子荣出席十一中全会的记录。]

¹¹ [周恒时任主管文教的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已被省委点名批判，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08。]

¹² [1966年7月14日陈毅宣布时任对外文委主任的李昌停职反省。见《1966.7.14陈毅在对外文委的报告》，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¹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话称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有10名中央委员去世，所以当有87名中委在世。但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时期”》页25-31，只有9名中委于此间去世，他们是：吴玉章、刘长胜、叶季壮、赵尔陆、贾拓夫、李立三、吴芝圃、曾希圣、张际春。另外，徐特立于1968年11月去世。]

² [自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有5名候补中委去世，他们是孙志远、古大存、周小舟、阎红彦、张霖之。]

³ [自黄永胜至李大章10人仅在会议开幕前才被递补为中委。]

⁴ [1980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起诉书中提到，1968年7月21日康生向江青提供了一份包括124名有政治问题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根据该名单，78名候补中委里仅有18人未被康生点名，自黄永胜至赛福鼎共14人均在此18人之列，另外4人是李涛、黄欧东、张宗逊、陶鲁笏。]

⁵ [见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

⁶ [见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

二、笔者尚未确定的8位未出席十一中全会者和3位出席十二中全会者，希望能有知情者指点。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二中全会之间去世的中央委员究竟是9位还是10位？

后学 陈闯创

2012年6月20日

卜伟华的解答

《记忆》编辑部

烦转陈闯创先生：

关于未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39人名单和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59人名单，我认为你说的都是有道理的。但你的判断又基本上都是通过二手材料得来的。在档案缺失的情况下，大概只能使用这种办法。我们都很清楚，依靠这种办法得出的结果，并不十分可靠。随着有关新材料的不断出现，我们可以不断修正我们的结论，使之逐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二中全会之间去世的中央委员究竟是9位还是10位，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好解决。最笨的方法，也是最可靠的方法，即将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的逝世时间全部查对一遍。

查对结果是9位，即：吴玉章、刘长胜、叶季壮、赵尔陆、贾拓夫、李立三、吴芝圃、曾希圣、张际春。可以肯定地说，在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在世的中央委员有88人。补选10人后，中央委员人数达到98人，超过了原来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数1人。至于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中说“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死去十人”，可以断定是说错了。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心细如发，办事认真的周恩来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错？如果说为了凑够过半数的法定人数也说不通。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要达到过半数的法定人数至少要49人，即使只补选9人，也可达到过半数的法定人数。

以上所说，仅供参考。

卜伟华 2012年7月4日

附：第八届中央委员 97 人逝世时间表

第八届中央委员逝世时间表

八届十二中全会前逝世者 17 人：

黄敬 1958 年、赖若愚 1958 年、林伯渠 1960 年、陈赓 1961 年、李克农 1962 年、罗荣桓 1963 年、柯庆施 1965 年、刘亚楼 1965 年、吴玉章 1966 年、叶季壮 1967 年、贾拓夫 1967 年、李立三 1967 年、刘长胜 1967 年、赵尔陆 1967 年、吴芝圃 1967 年、曾希圣 1968 年 7 月、张际春 1968 年 9 月。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逝世者 80 人：

徐特立 1968. 11. 28、刘少奇 1969、贺龙 1969、陶铸 1969、许光达 1969、王维舟 1970、徐海东 1970、林彪 1971、陈毅 1972、曾山 1972、谢富治 1972、邓子恢 1972、钱瑛 1973、彭德怀 1974、陈郁 1974、滕代远 1974、王树声 1974、张云逸 1974、王稼祥 1974、陈绍禹 1974、马明方 1974、郑位三 1975、李富春 1975、董必武 1975、康生 1975、周恩来 1976、张闻天 1976、朱德 1976、毛泽东 1976、林枫 1977、陈少敏 1977、罗瑞卿 1978、欧阳钦 1978、安子文 1980、邓华 1980、张鼎丞 1981、廖承志 1983、杨秀峰 1983、谭震林 1983、李维汉 1984、粟裕 1984、萧华 1985、刘伯承 1986、黄克诚 1986、叶剑英 1986、乌兰夫 1988、谭政 1988、刘晓 1988、萧劲光 1989、胡耀邦 1989、李井泉 1989、陈伯达 1989、林铁 1989、蔡畅 1990、徐向前 1990、程子华 1991、邓颖超 1992、胡乔木 1992、聂荣臻 1992、李先念 1992、刘格平 1992、王震 1993、刘宁一 1994、陈云 1995、陆定一 1996、王首道 1996、邓小平 1997、彭真 1997、刘澜涛 1997、伍修权 1997、杨尚昆 1998、舒同 1998、王从吾 2001、习仲勋 2002、李雪峰 2003、宋任穷 2005、李葆华 2005、薄一波 2007、萧克 2008、吕正操 2009

2012-07-04

余汝信的解答

《记忆》编辑部：

承蒙垂询，兹将陈闯创先生提出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及十二中全会的一些问题简复如下：

由于官方渠道信息的不公开，要回复陈闯创先生所提的问题，大多只能如同猜谜。猜得对与否，惟请陈先生自行判断。

1、确如陈先生提及，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时，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存世者共180人。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人数，会议公报并未公布。首次公开披露出席人数的，似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到会，有关负责人和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包括聂元梓）47人列席会议。”（《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51）

2、在未有可靠的新材料出现之前，暂同意陈先生的提法，即“有23名中委、16名候补中委共计39人因为各种原因未参加会议”。

3、陈先生列出的20位未出席的中委名单中，陈云应排除在外。据《陈云年谱》，1966年“8月1日-12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页139）另据新华社电，陈云出席了8月18日的首都百万人大会。一般情况下，只相距一两周的时间，没有理由仅出席后者而不出席更重要的前者。

4、参考陈先生已做了很多考证工作的“未出席的中委”名单，以及参考8月18日、31日，9月15日，10月1日出席毛接见大会的中委名单，以下为笔者试列出的未出席的中委名单：陆定一、罗瑞卿、彭德怀、彭真、黄克诚、滕代远、谭政、杨尚昆、李维汉、王稼祥、刘长胜、萧克、王从吾、张闻天、曾山、郑位三、欧阳钦、习仲勋、刘格平、贾拓夫、李立三、陈绍禹（在苏联）、杨献珍。以上共23人。

5、以下为笔者试列出的未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名单：潘自力（在苏联）、刘仁、万毅、黄火青、徐子荣、古大存、冯白驹、洪学智、蒋南翔、王鹤寿、陈丕显、周桓、张仲良、杨易辰、周小舟、刘震。以上共16人。

6、笔者认为，更应关注的，是会议公报提及的、列席会议的毛进行文化大

革命的新力军“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47人的名单。建议陈先生可试列出来再行讨论。

7、八届十一中全会与十二中全会之间去世的中央委员，确实应为9人。即：吴玉章、叶季壮、张际春、刘长胜、赵尔陆、贾拓夫、李立三、吴芝圃、曾希圣。周恩来为什么要说成10人？是疏忽还是另有原因？值得探究。

8、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同样未有公布出席、列席人数。《大动乱的年代》称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委19人，黄永胜等10人补为正式中委，出席全会的中委、候补中委共59人。列席74人。

八届十二中全会前的1968年7月21日，康生曾写给江青一封亲笔信，附送了他亲自排列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分类定性名单。此为现判断十二中全会出席者名单的一个重要依据。此名单是否就是为十二中全会以至九大作组织上的准备的？同样值得探究。

9、根据康生名单，他认为八届中委中没有问题的有20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刘伯承、谢富治、董必武、徐特立、蔡畅、邓颖超、王首道、陈郁、杨得志、张云逸、罗贵波、李雪峰、刘格平、韦国清（康生在罗贵波、刘格平两人的名字后打了个问号）。“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18人：朱德、陈云、徐向前、陈毅、李先念、聂荣臻、萧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叶剑英、邓华、邓子恢。（《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附件二。以下康生名单同出自于此，不再一一注明。）

估计以上38人应出席十二中全会。

康生名单另列“有病的”3人：滕代远、谢觉哉、王维舟，“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2人：宋任穷、舒同。此5人中应有2人出席，很有可能是后两者。

10、根据康生名单，候补中委中他认为没有问题的17人（并非陈先生所说的18人）：李大章、许世友、陈锡联、陈奇涵、张宗逊、李涛、黄欧东、吴德、黄永胜、桑吉悦希、张达志、赛福鼎、潘复生、刘建勋、唐亮、刘子厚、韩先楚。

以上17人应出席十二中全会。

康生名单中另列“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考查的”候补中委12人：潘自力、杨

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其余出席2人，似应在此12人中。

11、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似未提及范文澜、宋时轮和李志民。康生的17人名单（非18人）并没有陶鲁笏。陶鲁笏在康生名单中是列入“靠边站，尚未列入专案的”5人之内的。

12、同样的，列席十二中全会的74人名单（比正式出席者还多！）比出席者更值得关注。且周恩来在开幕式讲话中提及这部分人时，全部视为出席者。望陈先生亦能试列一名单再行讨论。

余汝信

2012-7-17

【检查与揭发】

交代我和吴冷西的关系并揭发吴冷西的反动言行

李慎之

我从1946年11月初到延安，就分配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担任编辑，当时吴冷西是国际部主任。但是工作了不到半个月，我就因为疏散离开延安，几个月后再回到延安，但是没有几天，就又疏散到太行了。一路上行军走了三四个月，新华社在中央各机关组成的疏散大队中，组成一个中队，吴冷西是中队的党支部书记，我是一个小队长。到太行以后，我仍在国际部任编辑，国际部主任是黄操良，吴冷西调任总编室秘书。逐步担任总编室发稿秘书，第一助理总编辑，进城后任第一副总编辑，总编辑，副社长，直到1952年任代理社长到正式社长。1950年新华社编辑部改组，废除原有的国际部、国内部，成立十个组，我被任为西方组副组长。这是我参加工作后最主要的一次提升，（当时废部建组，组长按部主任待遇）但是决定我的提升的是当时的社长陈克寒同志，在任命以前，他曾找我谈过一次话。1952年夏，西方组、东方组与苏联东欧组又合并成为国际部，我被任命为国际部副主任，一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撤除职务。

1952年国际部成立后我就赴东欧整整半年，1953年初回国后又马上去朝鲜，呆了整整一年，这一段时期及以前同吴冷西的接触都很少。1954年我同吴冷西一起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回国以后，我才正式担任国际部副主任的工作，参加每日汇报与扩大编委会，同吴冷西的关系比过去接近了许多。但是我同吴冷西并没有私人友谊，我从来没有去他家作过客，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共同兴趣。

从现在看起来，新华社在进城以后就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办社的路线。1949年新闻总署成立之后，署长胡乔木同志（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提出“消息总汇”的方针，一直在新华社无条件地执行。当时在业务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越来越深，从社领导起都认为进城以后局面扩大，自己水平低，能力不能胜任，然而解决的办法却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57年以前的干部理论学习，内容完全是干部必读、十二本书，特别是以联共党史为重点，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根本没有提出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而是千方百计要向资产阶级的新闻学学习，

先后搞了“练笔运动”，“三五百字”新闻“多，短、快、好”等等好多次业务上的运动，内容完全是追求技术，追求形式。

1953年吴冷西访问塔斯社，1954年底朱穆之又率领一个数十人的代表团到塔斯社去留学，回来以后有好几年大力提倡学习塔斯社，实际上大力推销贩卖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货色。在这段时期中，对外部的顾问，英国修正主义者阿兰·魏宁顿成了一个“祖师爷”，不断地“传授”各种“新闻写作法”，写文章、开讲座，新华社领导上虽然表面上拿着一副“以我为主”的架子，实际上是完全拜倒在他的脚下。我自己也是这样一条新闻路线的积极执行人。

回头来看，在进城以后，吴冷西的修正主义思想就一直在发展着的，而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有迹象表明，吴冷西的修正主义思想已经发展的政治上了。

苏共二十大是一次修正主义的大会。大会闭幕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对这次大会上提出三个修正主义论点（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还有一点已记不清楚，似乎是主张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合作这一点）是含蓄地提出了批评的，（当时吴还不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但是中央的意图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吴对苏共二十大的各项传达却都几乎是无保留地照转苏共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批判。我还记得有一次，吴召集了部主任以上的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宣读了一遍，朱德同志出席苏共二十大以后搞到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许多人听了以后都信以为真，吴却无一字批判，念了一通就散会。从那时起在新华社干部中就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泛滥的情况。

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新华社编的第一条消息原来是苏联东欧组写的，把事情就写成是反革命暴乱。当时由我值班发稿，因为事情重大，特别向他请示，他又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请示，据他说，陆定一说，我们共产党人对凡是有人民群众的地方要谨慎，不见得一定是反革命暴乱，我因此曾遵照他的意旨，要求苏联东欧组把这条稿子改写成是匈牙利人民自发的骚动，后来又经过吴冷西送中宣部审查，过了几天才退回来，还是写成反革命暴乱，这条新闻当时起了很大的影响，吴冷西非常得意。在反右斗争时，群众曾揭露了我的这一条罪状，但是事实上的来源却是陆定一和吴冷西。

1956年春，全国完成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这实际上是由民主革命过渡

到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深入开展的标志，可是吴冷西却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敲锣打鼓完成了，新华社今后还搞什么呢？只有搞技术革命了”。这一番话不但同他后来（1957年）访问路透社、法新社回来在新华社刮起的一阵妖风（主张翻译搞什么计件工资，培养薪金级别超过社长的“大记者”）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实际上是鼓吹当时右派分子一条主要的谬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对其后新华社右派思想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苏共二十大以后，吴冷西自称得以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成了通天的干部，大鸣大放开始以后，他可以参加中央统战部之类召开各种鸣放会议，或者听取汇报。吴冷西常常在每日汇报会上传达他所听到的各种消息。他确实很少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但是在传达中却大量客观转播各种资产阶级右派谬论，不加批判，而且因为他是把这些东西同中央首长的意见一起“传达”的，听者简直搞不清楚什么是错误的。我的右派罪行当然要由我自己负责，但是他确实给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现在还记得的有，他虽无批判地转达过某一个会议上一些资产阶级权威科学家的意见，说“美国、英国的科学家没有什么组织，科学也很发达嘛”。另外最突出的是在北大的右派对党展开猖狂进攻，要求改变八大党章所规定的学校党委制。他在传达陆定一的话说，“现在一切问题都要从根本上考虑，党委制可以改变，连党组制也可以考虑，党章也可以修改嘛”。这句话在当时的煽风点火的作用是极大的。使人感到似乎什么都可以怀疑，什么都可以改变的样子。

他在新华社所做的鸣放动员报告，提出所谓“四完”，即“有意见提完，有批评讲完，有气出完，有冤伸完”。当时起了极坏的效果，但是我后来却长期把它当作他是执行了中央“引蛇出洞”的策略，没有敢怀疑他在其间也夹带了黑货。这个会议是全社性的，我是参加了的，此外他还独自召开了几个小型座谈会，除同志们已揭发的外，还有一个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大概也有煽风点火的行为，可以向当时参加这个会的同志调查。

1957年6月6日六教授发表的一个所谓《对于我国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纲领，在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重点批判，但是新华社当时转发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播发似乎还在人民日报6月8日反击右派的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我不知道这个右派文件是谁经手播发的，

但是，这个纲领的播发充分说明了当时编委会思想“右”的程度。这是当年“四一六事件”，吴冷西无论如何是逃脱不了责任的。

大鸣大放期间，吴冷西的传达真是多极了，我记得的有上海会议、杭州会议等等，似乎都是中央召开的有当时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参加的，他大概都参加了的会议，许多记录我都记入了国际部的交班本中。这个交班在停职、反省后即已交出，组织上可以向国际部调阅当时的交班本，仔细检查吴冷西在当时到底夹带了多少私货。

我的右派罪行的第一条就是大量搜罗各国党的各种修正主义观点，刊入内参，加以散布。我的这一条罪行是无可否认的，然而我要人编的这些内参材料这项工作，吴冷西是知道的，因为他每天要看内参。但是，他不但没有阻拦我、批评我，反而在汇报会上一再表扬我，说什么“陆定一同志认为新华社这个工作做得好”。

我在1957年5月在国际部墙报《春雷》上发表的那篇反动透顶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对大学党委制的讨论和新华书店体制的讨论给了我最大的鼓舞”。“也可以说是给了我写墙报鸣放的动力”。“新华书店体制的讨论”内容是什么，我已记忆不起来，最大的可能也还是从吴冷西的“传达”中听来的。

1957年底，毛主席曾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原国际部参考消息编辑）到国际部来征求我们对苏共二十大的意见，我同王飞（主要是我）发了一大通右派谬论，这一条后来虽然没有列为我的右派罪状，但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我批判的重点，是我右派思想的集中表现。王飞和我在向林克同志提出这通意见以前，曾先向吴冷西汇报过，他确实是没有表示赞成的意见，然而却也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说“你们可以谈嘛”。以后我只觉得吴冷西真是一个不会错误的人，到那儿也不说错话。但是，现在回头看，他的倾向在哪一方面是十分明确的（我所提意见的内容，是口头说的，并无存底，但林克同志有记录，在批判我的大会上曾宣读了这份记录，在我的档案中一定有材料的，组织上可以调阅）。

关于吴冷西的干部政策，有一件事情是突出的：1957年年初新华社党总支按照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改组为党委会。编委决定要抽一个“政治上强”的人去当专职书记，内定为当时国际部的副主任支部书记普金，但是普金在吴冷西同他谈话以后居然公然在国际部办公室对我们说：“我对吴冷西说，我同党的政策（我

不了解他说的政策是什么，可能是统购统销或合作社）有重大原则分歧，不能（实际上是他不肯）当党委书记”。这句话当时给我的印象简直是震惊已极，我从来还没有听到过一个党员讲出这样的话来（普金当时在人前的表现是一个沉默寡言，一贯以正确自居的伪君子），但是后来吴冷西居然还是让普金当上了党委书记。事实上普金的父亲是地主，当时已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普金当时已劣迹多端，一当上党委书记更利用职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判定为反革命分子兼坏分子。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迄九年，我没有再同吴冷西有过什么接触，只除了1960年春节会餐会上见过一次面。那天是除夕，我们一批新华社下放到柏各庄农场改造的右派分子早一天刚刚回到北京，由保卫处负责我们的改造的同志组织参加春节会餐会。我和庄重和其他几个右派分子，还有一些社内同志安排在一桌。会餐将完的时候，刚好吴冷西带着朱穆之、邓岗等其他社领导人（具体是谁已记不真切），一桌一桌走过来向大家敬酒，走到了我们那一桌。我们站起来以后，庄重大概是因为刚在柏各庄受到斗争的关系，而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一时空气非常紧张，过了半晌，吴冷西就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对你们还是有很大希望的”。然后就走了。我当时站在一旁没有说一个字，但是回到宿舍以后也哭了一场。这件事情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但是在我思想上是引起了幻想的，我曾多次在思想汇报中表示了自己感奋的心情。

除了这一次以外，我九年以来没有再见过吴冷西（只除了偶然在路上碰见或者听他作报告），现在大家揭发的，他曾想保护我过关，后来又想起用我，我并不知道。只是1962年大刮翻案风的时候，我思想十分浮动，曾经想给他写信要求组织上甄别自己的问题，但是写来写去，总觉得自己没有可以成立的理由，那封信始终没有写成。因此也始终没有提出要求甄别。

1963年暑假外训班领导人雷文通知我编委要调我回国际部，但是我当时因为思想没有改造好，认为①自己成了右派，失掉了党籍，在政治上已不可能有前途，不能再做政治性极强的国际新闻工作，②在国际部经过全部大会批判斗争，彻底搞臭，已无面目再回去，因此坚决不愿再回国际部，而想外调到科学研究机关去。当时我想既然要我回去是编委的意思，只有向吴冷西要求才能够达到外调的目的，因此曾给吴冷西写了一封极短的信，要求他接见我，我好提出我的要求。

但是他把我的信交给了党委，结果由王天章接见了。王天章向我表示“冷西现在忙得很，不太管新华社的事了，因此我来跟你谈一谈”。他表示还是希望我回国际部，我则表示不愿意。后来我为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又曾给吴冷西写过两封信求见，但是他没有理睬我。我无可奈何，就求见朱穆之，一直到1963年底才见到。朱穆之还是要我回国际部，我还是表示想外调。我当时除了向他谈到希望去国际关系研究所之外，还提出是否可去人民日报，理由是因为人民日报有一个理论部，我从个人打算出发，总想能搞学术研究工作，事实上同吴冷西并无任何接触。朱穆之看到我主意非常顽固，就表示我的工作问题最好还是找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谈，意思是不想理我了。因此我又写了一封信求见邓岗。一直到1964年7月，邓岗才召见我，告诉我同意我外调国际关系研究所，并且说他问过吴冷西也同意，叫我等着做鉴定办手续。但是等了一两个月没有下文，我又找过干部处长喻俊庭同志一次，他告诉我听候决定，不必打听。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以上同朱穆之、邓岗、王天章、喻俊庭的谈话也是我九年来同他们唯一的接触。

反右以后，我自己的思想没有得到真正改造，心情很阴沉，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已不再有前途，在1962年一度希望能甄别平反的幻想破灭以后，尤其是如此。党当时分配自己做教英文的工作，但是我总觉得我教英文是外行，尤其是不愿留在新华社，总想到一个什么学术研究机关去，上焉者还想能做一些理论研究工作，下焉者就想做一辈子的资料工作或翻译工作，认为比较起来，这样还是“用我所长”，心情可以舒畅些。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埋首书丛，了此残生”，实际上是想逃避阶级斗争的风浪，逃避人民群众的监督。1965年小整风中，我向党交代了这个思想，经过同志们的批判帮助，小整风以后，我自己觉得树立了一辈子做英文教员与“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决心，自己心情上与从前相比是有了很大的转变，自己觉得似乎有了一点“改造”，但是实际上，思想立场仍然并无根本转变，仍然没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教学工作中继续还表现出一些错误，这些待以后另外交代。

以上所交代的一切，我愿意负完全责任，如有不符事实之处，甘受党和国家的严厉制裁。

（李三达供稿）

【资料】

蒯大富 1966年6月27日“声明”

1966年6月27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礼堂与“工作组”辩论的大会上发表声明：

（一）不管怎么样，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的错误，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建议大家好好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文，对照我校目前情况，再认真分析、思考。

（二）我非常体谅、非常理解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我采取的态度。如果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你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三）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除我以外），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我将逐个澄清。不过这表明了他们是非常软弱的。

（四）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我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五）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一万个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打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

（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很高的。我们的叶林同志，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

（七）再诚恳进叶林同志一言，这样的大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望您考虑。很可能起着很大的压制作用。

三思啊，同志们！

（唐少杰供稿）

【来信选登】

《记忆》编辑部：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流传较广的译稿，是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一位美国搞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分子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里头有这么一段批判英文版《毛最后的革命》的文字：

“MacFarquhar 接着引用了所谓的毛的声明：‘希特勒这个人甚至更凶残。越凶残越好，你认为呢？杀人越多，你越革命’。这是一个非常肮脏的说法。来看一下这本书后的注释，看它是怎样说的：‘来自作者之一看过的一个非常可信的来源’。真让人目瞪口呆，他引用来证明毛发动文革的杀戮欲的证据，竟然来自 MacFarquhar 自己提供的文件？看一看知识分子的这种无耻，毛是个魔鬼的证据完全来自于毫无根据的、根本不可能被证实的道听途说。这太恶劣了。”

我愿意向凡是看过上述文字的国内同仁交代一下这里的实际情况。曾经有个法国学者 Prideaux 女士给我来过 email 问我那段文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当时已经跟她说清楚了，并把我的答案转给“老马”（即 MacFarquhar）备案。

一、看过那个“非常可信的来源”的“作者之一”是我本人，老马没看过，是译自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专门为撰写历史决议的秀才（们）提供的历史资料集《“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中册第 201 页，原文为“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1973 年 4 月 7 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你可能会这样问我，为什么在出版于 2006 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出的中文版里，都没有交代这个“出处”的实际来源呢（参见《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第六章，第二个注释）？我的回答是：那是因为曾经让我于 1994 年夏天匆匆忙忙地翻阅那个珍贵的《资料选编》的老一辈文革史学家直到《记忆》创刊前一年（即 2007 年——编者注）还在世，所以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这样“保护”他——因为当年发放这个《资料选编》范围极小，我怕我一“点名”或提供“线索”，人家就会找他的麻烦。

二、因为毛泽东的语言很“政治”，其真实含义不好翻出来，结果我（责任还是我的，老马没过问此事）把部分意思应该说是翻译错了。这是我跟 Prideaux 女士说明白的主要内容。应该说，这也是让那位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发怒的主要原因（他没找过我，我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我考虑过，是否有必要叫哈佛大学出版社专门为此改译英文版？这并不是做不到，但是我担心，在目前这种大气候下，越抹越黏糊——本来没注意这事的外国人更来劲，他们会跳出来那个“作者之一”的我想和稀泥，玩文字游戏等等，以便掩盖毛的“滔天罪行”！思来想去，我决定算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借贵刊一角，告诉中文版的读者们：凡是对毛的原话和毛“所思”感兴趣的人，一可以参看上面说的那个《资料选编》，二可以找我，听听我的“交代”。至于别人么，就只能敬谢不敏——他爱骂《毛的最后革命》的作者，就让他骂去呗！

沈迈克

7月18日于瑞典隆德大学

